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京内资准字0609-L0057号
北京交大印刷厂印刷

中国教育科研参考

2014年 第 21 期
总第(343)期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编

2014年11月15日

目 录

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	教育部 (02)
高校在新型智库建设中的使命担当·····	李卫红 (04)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实践与总结·····	胡鞍钢 (05)
我国高校智库建设相关问题及对策研究·····	秦惠民 谢水青 (11)
研究型大学智库建设模式与困境突围 ——基于“学者”使命的视角·····	郭华桥 (18)
发挥高校优势 打造新型智库 ——专访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张东刚·····	《中国教育报》(26)
中国智库仍需多维度破题攻坚·····	《人民日报》(31)

编者的话: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智库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高校人才资源集中, 学科门类齐全, 研究实力雄厚, 对外交流广泛, 是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力量。当前, 我国高校智库的发展仍然滞后, 未形成与国家发展相匹配的决策咨询力和社会影响力。如何提升高校智库参与政策咨询、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 发挥与社会公众互动、引导社会舆论的优势是高校智库建设的重要方面。本刊以“高校智库建设”为选题, 集中选编若干国内外相关文章, 供读者参阅。

主 编: 王小梅 本期执行主编: 范笑仙 责任编辑: 聂文静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中教仪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
邮 编: 100082 电 话: (010) 59893297
电子信箱: gaoyanbianjibu@163.com

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

教育部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和刘延东副总理在“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制定本计划。

一、服务国家发展，明确建设目标

1. 明确高校智库的功能定位。高校智库应当发挥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的重要功能。一是发挥基础研究实力雄厚的优势，着重开展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为科学决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二是发挥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围绕重大现实问题，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提出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三是发挥人才培养的优势，努力培养复合型智库人才，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四是发挥高校学术优势，针对社会热点问题，积极释疑解惑，引导社会舆论。五是发挥对外交流广泛的的优势，积极开展人文交流，推动公共外交。

2. 建立形式多样、结构合理的高校智库组织形式。按照总体设计、点面结合、突出重点、分类实施的原则，创新体制机制，整合优质资源，打造高校智库品牌，带动高校社会服务能力的整体提升。一是以学者为核心，支持和培养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端智库人才和咨政研究团队。二是以机构建设为重点，培育建设一批具有集成优势的新型智库机构。三是以项目为抓手，改革科研项目管理，提高应用研究项目质量。四是以成果转化平台为基础，拓展转化渠道，搭建高端发布平台。

二、聚焦国家急需，确定主攻方向

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结合高校优势和特色，统筹规划高校各类科研机构、人才

团队和项目设置，凝练智库建设的主攻方向，力求在以下关键领域、关键环节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

1. 经济建设。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重大问题，重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创新驱动发展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财税体制改革、金融创新与安全、粮食与食品安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重点领域研究。

2. 政治建设。围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重点推进发展人民民主、行政体制改革、公共治理创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司法体制改革、民族与宗教问题等重点领域研究。

3. 文化建设。围绕提升国家软实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重点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文化产业发展、中国文化“走出去”等重点领域研究。

4. 社会建设。围绕民生保障与改善、社会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重点推进教育现代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人口发展战略、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等重点领域研究。

5. 生态文明建设。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重点推进国土开发、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研究。

6. 党的建设。围绕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等重大问题，重点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等重点领域研究。

7. 外交与国际问题。围绕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等重大问题，重点推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周边环境与周边外交、新兴国家崛起、海洋战略与海洋强国政策、反恐维和、全球治

理、公共外交等重点领域研究。

8. “一国两制”实践与推进祖国统一。围绕“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重点推进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深化内地与港澳经贸关系、推进两岸交流合作等重点领域研究。

三、整合优质资源，建设新型智库机构

1. 以2011协同创新中心和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为抓手，重点打造一批国家级智库。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进、贡献重大”的总体要求，认定和建设一批国家“2011协同创新中心”。深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运行和管理体制改革，实行“有进有退、优胜劣汰”的动态管理和弹性经费制度，完善总体布局，推动重点研究基地从整体上向问题导向转型，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2. 实施社科专题数据库和实验室建设计划，促进智库研究手段和方法创新。围绕内政外交重大问题，重点建设一批社会调查、统计分析、案例集成等专题数据库，和以模拟仿真和实验计算研究为手段的社会科学实验室，为高校智库提供有力的数据和方法支撑。

3. 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为依托，扩大高校智库国际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完善结构布局，创新组织形式，重点建设一批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基地。推动高校智库与国外一流智库建立实质性合作关系，建立海外中国学术中心，支持高端智库参与和设立国际学术组织、举办创办高端国际学术会议。

4. 加强高等学校软科学研究基地建设。以综合性大学现有的高水平战略研究机构为基础，培育一批面向国家和国际重大科技战略问题的国家级智库。培育、鼓励行业特色院校组建行业、产业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形成全面覆盖的行业、产业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支撑网络。面向区域发展需要，在高校培育一批面向区域产业发展需要的特色政策咨询机构。

四、发挥人才关键作用，着力培养和打造高校智库队伍

1. 实施高端智库人才计划。遴选确定立场坚定、理论深厚、视野开阔、熟悉情况、掌握政策、

联系实际的200多名高校专家，建立咨政研究核心人才库，给予长期稳定支持。构建密切联系机制，引导和支持专家围绕全局、战略问题和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提出政策建议，适时向公众发布研究观点，引导社会舆论。

2. 实施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跟踪培养计划。对参加中央六部门举办的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学员进行跟踪培养，组织参与实践考察、社会调研、挂职锻炼，在各类人才计划、团队建设、科研项目、出国访学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培养一支智库建设的骨干队伍。

3. 推动智库人才交流。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有计划地推荐高校智库核心专家到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挂职任职。聘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党政、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参与高校智库研究工作，形成政产学研用之间人才交叉流动的良好格局。

五、拓展成果应用渠道，打造高端发布平台

1. 建设中外高校智库交流平台。围绕国际国内重大热点问题，支持高校与国外高水平智库开展合作研究，举办高层智库论坛，打造高端引领、集中发布、影响广泛的高校智库成果发布品牌，发挥高校智库引导舆论、公共外交的重要作用。

2. 加大智库成果报送力度。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机构、项目团队咨政建议的报送工作。建立咨政报告数据库，定期收集、整理、分析和反馈相关信息。拓展《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专家建议》报送渠道，加大报送力度，建立定向征集、集中报送的工作机制。

3. 加强成果发布管理。制订实施《关于加强和规范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发布管理的实施办法》，规范发布流程，切实把好政治关和质量关。

六、改革管理方式，创新组织形式

1. 大力推动协同。支持高校智库与实际工作部门联合组建研究团队，主动加强与政府研究机构、社科院、科学院、工程院，以及民间智库等的合作，强化高校之间及高校内部的合作，着力构建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深度融合、多学科交叉的协作机制。密切关注、全程跟踪党和政府重大决策，及时提供动态监测、效果评估和信息反馈。

2. 改进科研评价。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评价

高校在新型智库建设中的使命担当

李卫红

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咨政启民”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新事物、新问题、新挑战不断涌现，加强智库建设既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也是回应人民期待、有效引导社会舆论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习近平同志就加强智库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为新形势下推动智库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

我国高校聚集了80%以上的社科力量、近半数的两院院士、60%的“千人计划”入选者，以及规模庞大的研究生本科生队伍，研究实力雄厚、信息资料丰富、对外交流广泛，是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高校积极服务政府决策和社会发展，“十一五”期间向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提交研究咨询报告6万多篇，为政府决策和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智力支持。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高校智库建设与中央的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比，仍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小、散、弱，高校智库型研究机构众多，但力量分散、定位不准、研究水平良莠不齐；二是高质量成果少，部分研究存在针对性实践性不强、过于学术化的问题；三是智库建设所需的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严重不足；四是高校科研评价、人才激励和成果转化机制还不能适应智库建设需要，影响了高校教师从事咨政研究的积极性，制约了高校智库潜力的发挥。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高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为导向，以提升能力为核心，以深化改革为动力，打造一批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端智库，构建特色鲜明、结构合理、形式多样的高校智库发展新格局。

明确主攻方向。出思想、谋战略、提对策，是智库的根本功能。高校智库建设必须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战略，结合高校优势和特色，明确主攻方向。

导向，实施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标准，把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实际贡献作为核心标准，完善以贡献和质量为导向的绩效评估办法，建立以政府、企业、社会等用户为主的评价机制。协调推进组织管理、人才培养、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综合改革，构建有利于智库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

3. 改革项目管理。建立后期资助方式，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给予后期奖励和持续支持。密切跟踪重大需求，与实际工作部门合作确定科研项目选题，完善课题立项和申报制度，提高项目设置的针对性实用性。

七、加强组织领导，提供有力保障

1. 健全管理体制。把加强智库建设作为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点任务，研究制定《关于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

社会服务能力的意见》等文件，做好统筹规划，明确任务分工，形成工作合力。

2. 完善政策配套支持。根据新型智库特点和发展需要，在研究生招生、经费投入、项目支持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在组织管理、人员评聘、科研活动安排等方面赋予更大的自主权，建立健全政策指导到位、保障措施得力、有利于激发智库活力的管理机制。

3. 加强经费保障。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多措并举筹集智库建设经费。完善经费使用机制，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实行绩效奖励。规范经费管理，加强绩效评估和审计，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原文刊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方网站，http://www.gov.cn/gzdt/2014-02/28/content_2625304.htm）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实践与总结

胡鞍钢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作出重要批示。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最高领导专门就智库建设作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丰富的一次重要批示。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包括四个重要内涵：一是把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表述，把智库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二是指出我国智库发展相对滞后，

一是建立重大决策跟踪机制。紧密跟踪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及时提供动态监测、效果评估和信息反馈。加强战略研究，就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超前研究，提供决策储备。二是完善理论联系实际机制。如选拔推荐高校智库优秀学者到国际组织任职、到实际部门挂职，参与政策制定，推动智库人才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三是建立与需求对接的新模式。邀请实际工作部门直接参与、共同确定智库的重点任务，联合组建研究团队，从源头上解决科学研究与决策需求脱节的问题。拓展成果发布应用渠道，完善专家建议报送机制，打造高校智库成果发布平台，增强对政府决策和社会舆论的渗透力、影响力。

提升创新能力。真正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实用性的政策建议，必须有厚重的理论、多学科的视角和先进的方法作支撑。推进高校智库建设，要从加强基础研究、推动跨学科研究和方法创新等几个方面提升能力、夯实基础。一是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发挥高校基础研究实力雄厚的优势，重点支持一批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安全具有长远影响的基础研究项目，推出对理论创新具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为提升应用对策研究水平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二是着力推动跨学科研究。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

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既指出差距，又表明发展需求迫切、空间很大。三是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目标。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智库发展的基本方向。四是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其落脚点是为中心的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主持召开“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

科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大力推进新兴学科发展，为应用对策研究提供更为有力的学科支撑。三是大力推动科研方法创新。吸收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文科实验室和数据库建设，推动资源共建共享，为智库建设提供有力的方法支撑和条件保障。

深化综合改革。建设新型高校智库，关键在于深化综合改革，创新体制机制，释放改革红利，激发科研潜能。一是改进评价制度。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评价导向，健全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标准，针对应用研究和新型智库的特点，建立以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用户评价为主的多元评价机制，把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实际贡献作为核心标准，改进绩效评估，形成有进有退的动态管理体制。二是完善开放合作机制。大力推动协同创新，积极探索开放、集成、高效的新模式，对封闭、分散的研究资源进行优化组合，组织多部门、多学科、多领域专家开展联合攻关。三是改进管理方式。推进高校智库建设，需要创新管理理念，加强宏观指导，完善顶层设计，提供有力保障。同时，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建立健全政策指导到位、保障措施得力、有利于激发智库活力的管理机制。

（李卫红，教育部副部长）

（原文刊载于《人民日报》2014年2月16日第5版）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

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决策机制越来越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不仅大大地增强决策的信息透明度，还扩大了决策的社会参与度，尤其是决策所需要的重要信息、专业化知识、国际经验、政策评估等方面的需求与日俱增。

从此，我国开始进入建设中国特色智库的新阶段。这就是打造一大批“国家急需、国际一流、制度先进、贡献重大”的中国智库，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庞大思想市场、巨大智慧财富的新局面。

那么，为什么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它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是什么？如何认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和特征？我们作为大学智库，又该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呢？我从事国情研究与国策研究已经有20多年了，一直在探索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如同“摸着石头过河”，从专业化到知识化，从知识创新到知识集成创新，从专业成果到思想成果，从个人研究到团队研究，从个人智慧到集体智慧，从非正规机构到正规机构，从国内影响力智库到国际影响力智库。

本文围绕着“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个主题，从自己创办智库的实践与经验的角度回答以上问题。在我看来，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长期实践问题，不只是一个目标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如何不断实现问题。我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和体会。

一、为什么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从参与国际竞争的客观需求看，中国需要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高水平、高质量智库。从国际竞争的多样性来看，世界主要国家间不仅有经济、科技等硬实力的竞争，还存在着思想、文化、话语权等软实力方面的激烈竞争。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硬实力已经实现了令世界瞩目的跃升，中国从成为世界第十位经济体上升至第二大经济体，从世界第二十九位贸易体上升为第二大贸易体，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经济增长贡献、减少贫困贡献、和平发展贡献。我们的研究表明，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名副其实的第二大综合国力强国。按八大类战略资源、18个量化指标计算的综合国力，中国占世界总量比重已经从1990年的5.60%提高至2010年的14.39%，与美国的相对差距从4.32倍缩小至1.22倍，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综合国力国。与中国“硬实力”迅速上升相反的是，中国还缺少“软实力”，尤其缺少国际舆论话语权、国际学术影响力，缺少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改革的权威解读，也缺少在世界重大问题上提出“中国主张”或“中国议案”。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2全球智库年度报告》，世界前100名的智库中，中国只有7家人榜。尽管该报告在搜集数据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是无论是智库的数量还是智库的质量（排名），中国均不占优势，属于典型的“后来者”。不过中国有可能成为“后来居上”者，这就需要中国智库实现跨越发展，勇于登上“世界舞台”，与西方智库“同场竞技”“同台比武”，也“同台合作”“同台协商”。因此，建设一大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中国提高软实力的战略需求，也是适应中国不断提高的世界地位与作用的客观需求。

从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政治需求看，需要一批专业化程度高、综合分析能力强、战略谋划能力强、决策服务能力强的优秀智库。我形象地比喻东方巨人需要“两个大脑”，即包括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政府智库的“内脑”，还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以及大学智库的“外脑”。无论是重大的、长远的战略决策，还是紧迫的、短期的政策决策，“两个大脑”总比“一个大脑”更聪明得多、智慧得多、远见得多。事实上，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越来越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也为各类智库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以国家“十二五”规划战略研究为例，就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各方面力量开展的重大课题研究，通过委托研究与公开招标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70多家科研机构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70余篇、35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成果凝聚了各方智慧，对“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从国内发展的社会需求看，当前中国正处于各类矛盾凸显期、各种思想观点交锋期，“无奇不有”的社会现象，“五花八门”的社会思潮，各方都在争夺“国内话语权”。中国社会亟需有影响力的智库提供准确信息、专业知识、正确观点和深刻思想；中国智库也有责任以高质量的智力产品回应民众重大关切，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开辟启迪民智、凝聚民心的新途径。这不仅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的迫切需要。

为什么党中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有什么背景和要求呢？刘延东副总理在2013年5月30日座谈会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国家软实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中国的大学在建设智库方面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此刘延东副总理还特别提到，高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生力军和各学科人才聚集的高地，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力量，要以服务决策为导向，以提升能力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依托，努力打造一批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端智库。

从全社会的视角看，高校作为国家最优秀智力资源高度集中的组织，是创造新观念、新知识的重要源泉。高校应更好地承担起服务决策、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的四大使命，以创新为核心理念，紧密围绕着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出思想，谋战略，建言献策，及时、适时提供更具有指导性、战略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战略思路、政策建议，为国家战略需求提供一流的咨询服务，通过独创思想、独到观点等知识产品对决策者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为此，中国高校尤其是名牌高校要有意识地打造高端的、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

二、如何认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什么是智库？“智库”是“智者之库”。它是一个国家的智者集聚之地，要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在国内，我们是“国家智库”，不是“私人智库”，是“知识为民、知识报国”；在国

际上，我们是“中国智库”，不是“美国智库”，要自觉代表中国核心利益，自主发出中国话语权，是“南方智库”，不是“北方智库”，要自觉代表南方国家共同利益，强力发出南方声音。

智库还是思想库。它是一种特殊的生产知识和思想的组织，创新主意、创新理念、创新思想是思想库最重要的产出。其根本任务，就是通过将中国发展和变革的实践条理化、系统化、理论化，承担好国家未来目标的“瞭望者”，国家战略的“谋划者”，国家决策的“建言者”和国家治理的“监督者”四大角色，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看得更准。

什么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除具备智库的共同特点外，还应具备“特”“专”“新”“优”的鲜明特征。

一是“特”，即要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相比其他智库，首先是国家不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虽智库的形式相同，但性质根本不同；虽研究方法相同，但立场根本不同。其次是客户不同，我们最大的客户就是党中央、国务院，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还要想国家之所未想。三是客户的价值与需求不同，这就决定了我们所提供的决策知识，一定是“知识为民、知识报国”。

二是“专”，既要专业化，又要职业化。这是一流智库的最重要的特点。作为专业化，就是某一领域权威的专家，能够与同行竞争和对话，也能够为同行所认同和尊重。作为职业化，就是在专业化的基础上，长期专题研究、深度研究、跟踪研究，做到融会贯通，不仅高出一筹，还要独树一帜。无论是专业化还是职业化，都是时间的增函数，需要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智慧资本的不断积累、持续积累、长期积累。

三是“新”，既要创新理念，又要创新组织形式。不拘一格办智库，集思广益谋创新，集学术智慧、人民智慧、国家智慧之大成，还要集历史智慧、世界智慧之大成。

四是“优”，不断创新质量高、影响深远的思想和智慧。及时提供高水平、可行性的发展思路或政策方案，不断发表有深度、有影响、有标志的优秀学术成果、代表作。

概括地讲，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两个服务”，即全心全意服务人民，服务国家；争做“两个一流”，即做中国一流和世界一流的专业化与职业化的智库；实现“两个贡献”，即为中国、为全人类贡献知识、思想和智慧。

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中国与世界，未来的中国不是“大师（个人）”的时代，而是“智库（团队）”的时代。智库不是“个体户”而是“集体”学术共同体，不是“个人”知识而是“团队”的各种知识集成。由此，智库作为一个高效率的知识创新组织，如同“知识企业”，与个人相比，集体效率优于个人效率，集体知识优于个人知识，集体智慧优于个人智慧。

三、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智库建设之路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是一个较为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也是一个干中学、学中干、“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我们独辟蹊径，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前进，不断提高，初步形成了一套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有效方法，基本找到了一条以国情研究与国策研究为根本的智库建设道路。

我从1986年开始从事专业化的国情分析研究，到2000年创立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情中心”），再到2012年国情中心升格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既长期参与智库研究，也长期亲手建设智库，至今已有近30年。回顾这一历程，大致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86-2000年），作为智库建设的先行者，我们于1986年创立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以下简称“国情小组”），这是不同研究所组成的跨学科课题组，不是“实体智库”，而是“虚拟智库”。这一阶段，我们借助多种研究方法对中国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条件和重大问题进行全面研判，为党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方面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咨询意见。从1998年开始，我们创办了《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在第一时间将国情小组的最新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成果送达高层决策者手中，还为许多其他研究者提供了上呈最新研究成果的通道，为智库的长远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个阶段（2000-2011年），我们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的支持下，创建了中国科学院-清

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情中心”）。这一阶段，“国情中心”从“虚拟智库”转变为“实体智库”。其最重要的产品，就是每年不定期发行的《国情报告》（含《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到2011年底，历年发行的《国情报告》已经编成14卷（1998-2011），每年1卷，共计27册，除1998年为1卷1册外，其余年份均为1卷2册，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和社会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系列报告强调政策建言的时效性和对重大决策的影响力，先后获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批阅数以百计，显示出极大的学术正外部性、政策正外部性和政治正外部性。

第三个阶段（2012年至今），根据清华大学提出的新百年建设目标和要求，原“国情中心”于2012年1月正式升格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由我出任首任院长。至此，国情中心的智库建设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正所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国情研究院积极联合清华大学其他哲学与社会科学相关院系构建“科研实体加研究网络”的智库，采用跨学科方式开展中国问题研究，设计中国中长期战略，认识和总结中国之路，加快建设世情、国情、党情和区情“四位一体”的研究体系，旨在建成以国家发展战略和重大公共政策研究为导向的决策思想库和当代中国研究基地。

我们以《国情报告》打造中国智库品牌。截至2013年年底，累计已出版《国情报告》正刊1034期、专刊等205期，共计1239期。2012年，党建读物出版社和社会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国情报告》丛书，共计14卷，27册。该丛书列入新闻出版总署“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同时是清华大学“985”（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工程支持项目。该项目属于大型优秀公益性出版项目，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参考价值。国情研究院的成长之路表明：中国智库的建设不是靠挂牌子、找名人、戴高帽，而是靠“天天读”中国这部“天书”，“天天写”中国这部“巨著”，留下记录和认识当代中国的“白纸黑字”，培养研究和设计中国的高端优秀人才，惟此，才能随着时间的久远就愈发显现出真正可宝贵的价值。

结合党中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从长远来看，我们认为国情研究院作为大学

智库，当前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国内外重要影响力”。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学术影响力，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内外最好的学术刊物上特别是当代中国研究刊物上不断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要采取有力措施，组成团队，选择前沿课题，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二是政策影响力，就是以《国情报告》为平台，持续增强我们在高层决策界的声音，既是学术界与决策界之间的信息桥梁、知识桥梁，更是发出“清华声音”，提出“清华建议”“清华方案”，在关键问题上为关键人物提供关键信息和建议。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和学术优势，我们仍然需要不断强化这一优势。三是社会影响力，就是要主动与主流媒体合作，成立各种形式的写作小组，有针对性地发表有影响力、有深度的评论性文章。这些评论稿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取决于其对国家有关重大决策的实际影响和长远影响。四是国际影响力，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独树一帜，代表中国学术前沿，代表中国学术学派，主动积极参与全球智库的国际合作与国际竞争。

四、中国智库建设的实践总结

我把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建设新型智库的思路和实践总结为“三个定位”“两个结合”和“四个建设”，即从中国特色、高校品牌和世界一流的目标定位出发，坚持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决策咨询与教书育人相结合，推进文化建设、团队建设、平台建设和机制建设。

第一，坚持中国特色、高校品牌和世界一流的目标定位。“中国特色”，就是要以“中国实践”为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中国风格”为特征，以形成“中国学派”为使命，以“重大矛盾与关系”为主题，以专业化研究为手段，以“综合集成”为方法，拓展中国道路、完善中国制度、概括中国理论。我们比较自觉地学习毛泽东、邓小平大战略的思路，与社会科学的科学化相结合，不仅是定性的，更是定量的，不仅是专业化的，更是思想性的，不仅是具体领域分析的，更是战略思路的。

“高校品牌”，就是要适应高校人才特点，突出高校领域专长，整合高校研究优势，打造智库所依托的“高校品牌”。我们通过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和决策建议，在国家重大经济社会战略决策

和国家中长期规划中不断发出“清华声音”“高校声音”，形成“清华特色”“高校特色”，打造“清华品牌”“高校品牌”。例如我们评估国家“十五”计划，参与国家“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前期研究和总体设计，参与国家中长期教育和改革发展规划、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又如我们关于2020年中国的研究，至今已经研究了3次，现在准备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进行第四次研究，即国家“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在关于2030年中国的研究基础上，我们正在研究“伟大复兴”课题。

“世界一流”，就是要不断强化智库的国家使命与社会责任担当，提升智库对国家重大决策的正面影响，提升国际竞争力，掌握国际话语权，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出版了英文著作10部、日文9部、韩文1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2020中国：一个新型的超级大国》（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2010年），成为目前在世界最有影响的三位中国学者的著作之一（其他两位是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和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我们即将由世界最大科技出版社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2030中国》《中国：创新绿色发展》《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等，还会引起更大的影响。我们正在努力使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数量和权威度跻身于世界前列，争创“世界一流”，将中国高校智库建设成为能够与世界一流智库直接对话的研究中心、研究基地。

第二，坚持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决策咨询与教书育人相结合。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就是“两条腿走路”，兼顾基础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直接相关的应用研究，以学术研究为基础，以政策研究为导向。我们的研究共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基础研究层次：研究中国国情与中国道路，从学理解释中国之路的成功之道。第二，重大战略层次：设计中国发展目标，参与制定重大国家战略与规划，建设具有国情与国策专业优势的思想库。第三，重大公共政策层次：从事发展挑战与对策研究，研究不同时期中国发展重大挑战的性质、背景和原因，提出应对挑战的科学思路与方案。

决策咨询与教书育人相结合，就是研究成果不仅要成书、成文或报告，服务决策、促进发展，

还要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传播知识，教育学生。我们的“国情研究”不仅广泛吸纳知名学者参与其中，还以此成为“教书育人”的大课堂，让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和青年教师在接触真知识、真问题、真方法的过程中得到锻炼，增长本领，提升才干。

第三，推进文化建设、团队建设、平台建设和机制建设。其中：文化建设，是智库建设的灵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已经形成了建设新型高校智库的组织文化。我们的追求是“与中国兴盛同行，与中国开放相伴，与中国变革俱进”；我们的宗旨是“知识为民，知识报国”；我们的理念是“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还要想国家之所未想”；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国家未来目标的“瞭望者”，国家战略的“谋划者”，国家智库的“担当者”。

团队建设，是智库建设的关键。要建设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骨干队伍，充分动员和训练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形成师生互动互补、教学相长的良好局面，使智库带头人的经验和智慧、研究骨干的知识和能力、学术新秀的才干和冲劲之间相互补充，相互激发，实现整个团队知识贡献最大化。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培养出16名博士、21名博士后，他们已经成为高端国情研究人才和专家。

平台建设，是智库建设的渠道。我们以《国情报告》作为决策咨询平台，形成服务决策的渠道和品牌，为中央领导和省部级领导同志提供世情、国情与区情的重要信息、决策知识和政策建议。这本身也成为我们的写作平台，反映并记录了不同时期中国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以及我们如何思考与应对。

机制建设，是智库建设的活力之源。包括形成激励相容的考核机制、奖励机制和团队协作机制。特别是我们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学、科研以及政策咨询相结合，学术带头人、研究骨干和学生共同参与的“小班制”，包括研究生培养、课题研究和文稿写作三类“小班”，将智库成员研究方向与课题聚焦领域统一起来，科学配置研究力量，以老带新，以课题促科研、促教学。同时，根据不同成员的研究方向和个人专长，为他们设置有计划、有时效、达到一定强度的评论性短文写作任务，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写作能力训练。每一次短文写作训练，

从我的角度，都需要选择好的题目、创意好的思想，加强具体指导，严格把关；从智库其他成员的角度，都需要以写出高水平的短文为目标导向，系统地研读相关《国情报告》，充分地占有智库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汲取其基本思想，揣摩其语言特色进而在新写出的文稿中彰显“国情文风”“国情特色”，并且不断修改、不断“打磨”，使文章成为达到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评论专栏、《求是》杂志、《红旗文稿》等平台刊发的精品文字，使我们作为智库不仅具备专业化的研究优势，还具备“提笔成文”的写作优势、第一流的“笔杆子”乃至高级政治秘书的人才培养优势，使国情研究院成为“专家+秀才”式高端人才的摇篮。

五、结语：走自己的路，实现跨越发展

世界一流智库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建设中国新型智库，对中国高校的智库建设提出了更高更切实的要求。根据《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2013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学位居世界第52位。实际上从第三方的评估来看，清华大学已经属于世界一流大学，但是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组年初发布《2012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在中国大学智库中，只有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在世界排名第63位。尽管这一排名有许多缺陷，但是也反映了清华大学的智库尚未进入国际视野，一流智库建设仍任重道远。

尽管我们尚未跻身世界一流智库行列，但在中国问题研究上，我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独具特色的基础，要立足中国、研究中国、理解中国，“不唯洋书、不唯洋人、不唯洋智库、只唯实”。实际上，作为我们的竞争对手，西方智库对中国的判断和未来的预测常常一错再错、错误百出。例如，以最著名的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为例，他们受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委托主持长达二十年时间的全球趋势研究，2004年12月发表《全球趋势2020：绘制全球报告》的预测表明：到2020年中国国内产出总值将超过单个西方经济强国（除美国之外）。2008年11月，该委员会发表《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专题报告，该报告中的综合国力为GDP，国防支出，人口以及技术四大类战略资源占全球比重的加权平均。该预测认为美国的综合国力占世界比重将从2005年世界的四分之一下降到2025年的22%，

我国高校智库建设相关问题及对策研究

秦惠民 谢水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先后对我国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指示。2月10日，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从多个方面对我国高校智库建设给予了明确指导，这标志着我国由政府统筹的高校智库建设正式启动。高校智库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运作和建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姿态高调呈现。

可以预见，随着日趋强化的关注进程，新一轮有关智库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高潮正在到来，高校智库建设也势必更多地进入公众视野。在这一节点性的历史阶段，有必要对相关问题进行梳理并探索应对的路径，具体包括：我国高校智库建设总体上处于怎样的基本状况；面临新的发展机遇，高校智库建设会遇到怎样的新挑战；在政府设计的总体框架之下，采取怎样的措施规避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才能推进高校智库建设沿着健康的道路稳步发展。

1. 我国高校智库建设的总体状况及优势分析

智库一词源于英文“think tank”，又译作“思

略有下降，而中国则从2005年的11%上升到2025年14%，略有上升。这意味着美国综合国力相当于中国的相对差距从2.27倍缩小至1.57倍。该报告再次预测：如按目前态势发展下去，中国到2025年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早在2010年，中国的GDP就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比该报告的预测提前了15年。为此，我们作为世界一流智库的后来者、追赶者，的确需要学习借鉴西方智库，但更重要的目的还是追赶西方智库、超越西方智库；我们需要向竞争对手学习，在学习中自我完善，自主创新。

中国是一片充满生机的沃土，我们要深深扎根其间，每天细细地吸收这沃土中的水分和营养，

想库”“智囊团”“脑库”或“外脑”等。现代智库发端于美国并兴盛于西方发达国家，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政府和社会。2014年1月22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了其“智库项目”研究成果《2013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经授权以中文与其全球同步发布。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智库总数为6826家，其中美国为1828家，且占据全球前10位顶尖智库的5个席位；我国智库总数为426家，虽然位居第二，却不及美国的1/4。国内有统计认为我国智库数量已经超过2500多家。尽管与国际统计可能存在统计口径的差异，但这种差距之大也足以说明：我国绝大部分智库无论从知名度还是影响力而言，都没有在国际上得到充分认可。

上海社科院年初同期发布了《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将我国智库划分为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四大类。党政军智库和社科院智库通称为官方智库。《2013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有6家智库位列全球顶尖智库前100名，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

培育出参天的学术之树。我们有意识地将学术种子播撒中国大地，使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进而茂密成林，使当代中国研究更加深广，使“中国学派”英才辈出，使“中国风格”蔚为大观。我们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广泛参与全球智库竞争，在世界舞台上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及时地发出“中国声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做出更具独创性和重要性的、更高质量的知识贡献、思想贡献。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北京 100084）

（原文刊载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关系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6家智库全部属于官方智库。《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设计了三类排名。在中国智库综合影响力排名前10位当中，高校占据3席，依次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在类别结构排名当中，综合影响力顶级智库排名前30位的智库，高校占据5个席位，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专业影响力排名只排出了前5位，北京大学的国家发展研究院位居经济政策影响力第5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分别位居政治建设领域影响力和城镇化建设领域影响力排名的第4、5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分别位居文化研究影响力第3、4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居于生态文明建设影响力第2位，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分别位居国际问题领域专业影响力第1、4位。从广泛搜索与甄选的200余家活跃智库的类别特征来看（未含高校智库），党政军智库和社科院智库占据75%的比重。另外有研究认为，我国官方智库和高校智库约占我国全部智库总量的95%，而民间智库占比还不到5%，且民间智库成员实际上大多在体制之内，属于兼职参与民间智库的课题研究。

由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我国智库建设当中，以党政军智库和社科院智库构成的官方智库占有绝对优势，民间智库实力微弱。高校智库对决策的影响与官方智库相比，虽并不具有优势，但从社会影响力来看，高校智库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与其他类型智库相比，从拥有的先决条件到政策研究的开展过程，从研究成果的公开发布到转化为决策方案的推广实施，高校智库都显示出独特优势和巨大潜力。

第一，从拥有的先决条件来看，高校具有开展政策研究的资源优势。置身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的时代，政府决策所面临的往往是综合性极强的复杂课题，所以，其需要的政策常常必须依赖于多种学科资源的综合配置才能实现。这种需求在具有多学科综合优势的高校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有组织地开展科学研究，虽然高校科研和政府决策研究

不是简单的对等关系，但却为政策研究创造了必要而雄厚的基础条件。与公共政策相关的学科建设、研究人才、科研设施，主要集中在高校，同时，高校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与社会公众群体有着广泛深入的互动关系，以及多层次、多类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关系。正如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指出的：“我国高校聚集了80%以上的社科力量、近半数的两院院士、60%的‘千人计划’入选者，以及规模庞大的研究生本科生队伍，研究实力雄厚、信息资料丰富、对外交流广泛，是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力量。”不仅如此，高校智库既拥有丰富的科研资源，又能够在已有基础上增殖资源，不断累积和增加学科基础、科研设施、专业人员、社会互动等各方面资源的储备，从而不断提升政策研究的能力。

第二，从政策研究的开展过程来看，高校具有政策研究的环境关系优势。独立性是智库的最基本属性，这是国际共识，也是智库得以产生和维系的基本要素。我国高校智库尽管大都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但由于其并不依附于党政机关，所以在工作开展方面比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具有更强的独立性，这使得高校智库的研究能够较大限度地超脱于政府有意无意的干预，从而在较大程度上保持政策研究的客观性和相对独立的立场。同时，高校智库的独立性又不同于民间智库，即没有像民间智库那样因为距离政府比较遥远而形成一种“游离”关系，还往往因为管理体制、人事联系、业务衔接、合作关系甚至专家圈子等各种纽带与政府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高校智库在把握全面情况、判断宏观形势、掌握数据资料、获得反馈信息，从而准确分析研判等各方面具有了民间智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上海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认为，高校智库既有相当的独立性，同时又与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使其有别于政府的智库，亦有别于民间的智库。高校智库与政府之间的这种像“豪猪取暖”一样若即若离、又恰到好处的特殊关系，成为得天独厚的优势。

第三，从研究成果的公开程度来看，高校智库具有与社会公众进行互动并引导社会舆论的相对话语优势。我国推进现代智库建设，公开性、互动性以及能够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话语权是需要特别加以倡导和培育的基本属性。在这些方面，我国大多

数官方智库表现得较为封闭，深藏在体制内，甚至笼罩着“神秘”色彩。英国《经济学家》网站刊载文章认为，“那些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并不为大众写作，而是为一个规模更小的群体写作。最有权力的研究所会出现在中国最具影响力智库的名单之上，但它们并不与公众互动，或彼此互动，同时也不是独立的。”而我国高校智库则优势突出，即有可能基于社会需求独立自主地开展研究，形成科学客观的研究成果，然后通过报刊、杂志、网络、论坛等大众传媒以多种渠道将研究成果广泛传播，表现出极强的公开性。公开的直接结果是引发高校智库与社会公众之间产生互动，社会公众真实的意愿表达能够促使高校智库进一步提升研究能力，从而越来越赢得公众的认可，并在此过程中获得社会信赖和实际的话语权。所以，互动不仅仅是提高高校智库的社会知名度，更重要的是能够对社会舆论产生引导作用，最终提升高校智库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话语权，扩大社会影响力，提高服务政府与社会的能力。

第四，从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府决策进而推广实施来看，高校具有催化政策效度的“公众形象”优势。影响、参与决策过程并促进决策生效是智库存在的价值依据，没有决策，就没有智库。决策被接受、得以推行并取得实效的程度，既取决于政府的认可程度，也取决于民主意识越来越强的社会公众的接受程度。高校智库因为高校的属性而拥有了与生俱来的“公众形象”优势。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大学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大学因为承载着人类对历史的沉思和对未来的寄托而长期深受推崇；从上个世纪开始承担起服务社会的使命以来，大学逐渐走出“象牙塔”，不断地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越来越成为社会的“轴心组织”，进一步强化了其社会认同感，这种良好的社会组织形象成为高校的一种无形而宝贵的独特优势。政府当然乐于借用高校智库背后依托的这种“形象”优势，社会公众也更容易信任和接纳高校智库提供的政策研究成果。这种优势，同样是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所不具备的。

2. 我国高校智库的问题及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尽管高校智库已经成为我国智库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亦如我国智库的总体发展情势相似，我

国高校智库远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与高校智库所具有的各种独特优势形成明显反差。当前，在国家通过政府统筹强化高校智库建设的背景下，高校智库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新问题和新的挑战。

2.1 我国高校智库的问题及原因探析。从我国高校智库从事政策研究、参与政策咨询、影响政府决策的结果来看，其问题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高校智库成果对于决策的贡献率较低。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近5年来，高校人文社科领域共出版著作约15万部，发表论文约158万篇，其中在国际刊物发表约2万篇。但在这些汗牛充栋、数量巨大的科研成果当中，对决策具有积极影响、真正转化为国家各部委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咨询报告、政策建议的仅有6万余份，得到中央领导批示或者被省部级以上部门采纳的仅为千余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70项，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近100项。这些科研成果对政策是否能够产生重要影响，其效果尚有待评估和检验。当然，高校常规开展的科研活动和高校智库的决策研究不能等同，但这组占比数据，至少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国高校智库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和参与程度，在整体上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第二方面，高校智库社会影响力薄弱。在我国智库数量结构当中，官方智库一方独大；同时，官方智库影响、参与政府决策的程度，由此对社会发展和社会舆论的影响程度同样是一枝独秀。从上海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明显看出，尽管高校智库在我国智库总量、综合影响力排名、专业影响力排名中占据了一定的席位，但与官方智库相比可谓差距悬殊，且高校智库高度集中于仅有的几家国内顶尖高校当中，高校作为重要的社会组织没有显示出整体的力量，因而对政府决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也远远低于官方智库，这与高校作为社会“轴心组织”的地位极不相称。

造成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高校自身素质考察，高校普遍缺乏足够的智库意识和智库能力。大部分高校更多沉浸在开展纯粹学术研究的传统里，还没有确立起较为明确的智库意识。虽然服务社会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高校重要职能之

一，但在现实中，我国的很多高校、尤其是研究型高校仍然难以完全摆脱“象牙塔”情结，热衷于进行纯粹的学术研究，“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经常对社会现实问题表现得比较淡漠。意识淡漠直接导致行为疏离，很多高校缺乏足够的智库热情与能力。无论是科研课题的选择与确定、科研人员的素质与组织、科研经费的筹措与安排，还是科研项目的遴选、科研任务的开展、科研目标的指向等各个方面，高校科研更多遵循的是学理逻辑的推演，没有把主要精力转移到为政府决策出谋划策、为经济社会发展把脉、诊断、开方、疗治等方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决策性科研本身也是一门具有独特要求与规律性的学问，缺乏足够的相应基础与训练，只能致使高校在面临决策性问题时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因而很难高效地出台高质量的决策建议。

其次，从所处的具体运行环境考察，高校智库整体缺乏匹配和适宜的运行体制和机制。我国高校智库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其与所在高校进而与政府部门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至今没有明确的原则性规定，绝大多数智库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虽然现有高校智库总体数量众多，但是各家智库却实力微小，智库相互之间又大多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合作，习惯于各自为战，科研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在学校内部，目前很多承担高校智库职能的机构，有的与科研管理部门或规划管理部门合为一体或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经常被视为高校的一个二级行政单位，往往还要承担科研统筹或规划管理之类的行政任务，智库角色实际上处于可有可无的边缘位置，缺乏与智库相关的人员管理、业务运行、经费筹措、成果实施、绩效考评等完善机制；有的则挂靠在高校的二级学院，在资源分配、人员安排、运行机制、管理方式、成果归属等方面往往存在某种程度的利益争夺甚至纠纷，影响到智库能力建设和智库作用的发挥。李卫红副部长指出：高校智库一方面缺乏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另一方面又缺乏科研评价、人才激励和成果应用转化的良性机制，进一步影响了高校教师从事咨政研究的积极性，制约了高校智库潜力的发挥。

最后，从整体社会背景考察，我国高校智库作用的发挥缺乏健康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尽管中

央政府提出了加强智库建设的要求，但很多地方政府以及很多政府官员缺乏相应的治理观念和治理思维，没有从内心真正认识到智库对于政府科学施政的重要意义，仍然满足于凭个人经验好恶自觉不自觉地干预智库成果的形成。甚至有的政府或政府官员把智库建设当成了显示政绩的“幌子”，仅停留在装样子、作表面文章，并没有真正想发挥智库的作用。智库的社会了解和认知程度还很低，广大社会公众对智库缺乏足够认识，并不清楚智库发展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究竟有什么意义，更有个别极端人士竟然将智库不加辨识地认定为就是一种“忽悠”，从心底就予以排斥。置身这样的社会舆论环境，高校智库发展难免受到不良影响和不公正对待。

2.2 我国高校智库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党和国家对智库建设的重视前所未有的，今年教育部出台的《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旨在对其进行大力倡导和科学规范，这为我国高校智库的建设和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和有利的政策环境。这一新的历史机遇，正在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兴趣，由此而可能产生的一哄而上和形式主义的机会争夺，是历史经验警示我们的深刻教训。如何把握这一历史机遇，真正实现推进高校智库建设，提高高校智库的水平和能力，要求人们必须充分认识和正确判断这一历史机遇所内涵的新要求和新的挑战，避免各种形式的偏离现象。对此，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和清醒，并在高校智库建设过程中及时预防。

第一，预防“追名逐利”的“动机偏离”。现代智库已经成为一个特指概念，本质在于由相对固定的非营利组织通过专业化的研究成果实现协助、影响甚至参与政府决策的目标。推进高校智库建设必须紧紧把握其本质所在。对于政府而言，可以通过资源杠杆引导智库的发展方向，引导是关键，但不能简单化为资源的再分配；对于高校而言，能够借助政府的扶持推进智库建设，通过优化自身的资源配置，不断提高决策研究的质量和水平，而不能将扶持政策偏离为索取资源、追逐虚名的机会。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在以往的各种“工程”项目中已有此类屡见不鲜的前车之鉴。实际上，在操作层面，偏离性的资源配置并不复杂，同样，偏离性的资源浪费亦可以非常简单。所以，在操作之前，应

该设计切实的制度框架首先保证动机的端正，进而促进良好动机的实现；否则，那种“众人拾柴”般的热情很可能就转化为觊觎名利的又一次的偏离现象。

第二，预防“大干快上”的“行动偏离”。国际范围智库的诞生、演变和发展壮大，大都经历了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一般认为，“智库”概念最早起源于二战期间的美国，当时指的是美国军事人员和文职专家一起讨论制订战争计划及其他军事问题的服务部门。战后，智库一词开始被用于军工企业中的研究与发展部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研究发展部。20世纪50年代，该部成为一个独立实体，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兰德公司。但实际上，类似智库的机构可以追溯至20世纪早期，比如1910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立；1916年美国政府活动研究所成立，1927年其与经济研究所、罗伯特·布鲁金斯经济政治研究学院合并为布鲁金斯学会，今天布鲁金斯学会被认为是全世界最顶级的智库；1919年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成立等。其他欧洲国家智库的形成与美国有相似之处。英国被认为是欧洲智库的创始国，其众多智库包括了三大类：第一类是工程咨询智库，因适应早期工程发展的需要而迅速发展；第二类是技术服务咨询方面的智库，主要以提供新技术、新知识为业务方向；第三类是管理咨询公司，提供广泛的诸如财政管理与行政管理、生产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调查与产品营销、提供情报与设计程序等各方面的咨询。德国和法国智库后来居上，他们的智库都是迎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迅速发展起来。简而言之，智库的诞生不是政府“催生”的结果，而是基于社会需求自然而然“成长”起来的产物。

由于社会体制、政策法规、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差异，我国现代智库从一开始就具有官方主导的特点，例如1977年5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基础上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大型国家智库建设。直到今天，中国的智库状态仍然维系着官方智库“独步江湖”的局面。我国公立高校的管理体制和社会服务性质，决定了政府对高校发挥智库作用以及对于高校智库建设的重视和要求。关键在于，这种重视、引导和推进，应该顺应“自然成长”的规律，要真正视决策研究为一门特殊的科学

研究，尊重和遵从科学研究的规律性。把中西方智库的形成打个比方，西方智库的发展过程就像一棵树的成长，是由树种在适宜的环境下“生长”起来，更多地是一个“内生”的自然过程；我国智库的发展过程则像盖楼，先搭起外部框架，然后进行内部装修，更多是一个外部塑造的人为过程。“种树式智库”与“盖楼式智库”并无质的优劣差别，实际上，“盖楼”应该更快一些，但如果简单地贪功求快，简单地以指标要求短时间内实现数量上的增加，就容易出现“急躁冒进”式的行动偏离，所以，“盖楼式智库”建设确实需要精细地谋划好“外框架”和“内装修”，确保楼房既外形美观又适用宜居。

第三，预防“纸上谈兵”式的“评价偏离”。衡量智库最重要的标准是其“产品质量”，即研究成果真正被政府借鉴、采纳和应用的情况，特别是其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如上所述，我国高校智库存在决策贡献率较低、社会影响力较弱等显性不足，其深层根源之一，在于一定程度地坠入了“纸上谈兵”的评价偏离陷阱。

所谓“纸上谈兵”的评价偏离陷阱，表现有二。其一是为社会所诟病的重量轻质的评价标准，在评价过程中，研究成果数量的权重高于质量权重，因为数量指标更容易表达，更容易通过各种载体表现出来；就像教师职称评审一样，往往科研成果的数量更占优势，至于成果是否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则往往难以度量。这种评价标准对智库研究所产生的导向，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出成果而出成果，甚至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寻找门路找领导批示，以能够拿到何种级别、何种数量的领导批示为衡量标准，而不是看其到底产生了什么性质和什么程度的实际效果。其二，是一种更加隐蔽的表现形式，即所谓智库研究实际上只是解读和论证领导意图的“经院哲学”。表面上看，智库产生的研究成果被政府所采纳，或者获得了重要领导的批示，但这种智库研究，不是深入实际独立开展调查研究的结果，而只是把脉领导的意图，通过揣测领导言论和心思倾向，投其所好，因此往往脱离实际，当然也就不可能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和收到良好的实际效果。这种所谓的智库研究本质上并不是真正独立的智库研究，而只是领导们的御用文人的“御

用成果”，难以真正起到智库的作用。

3. 促进我国高校智库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高校智库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遵循智库所应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实践性、服务性、公开性、互动性、话语权等基本属性，针对我国智库建设现实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系统规划设计：一方面将高校智库所蕴含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另一方面有效规避新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新问题。

3.1 营造重视高校智库的社会环境

首先，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在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推进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加强对高校智库建设的重视程度。由于我国智库总体属于“盖楼型智库”，政府姿态会起到强烈的导向作用。政府必须真正树立起依靠科学决策推进施政的现代治理理念，并将这种理念强烈地表达和呈现出来，要主动向高校智库征询决策谋略和政策方案，通过需求引导生产，从而极大激发高校智库参与决策研究的积极性；政府“采信”高水平智库研究成果的力度越大，越能够赢得高校智库的“真实”服务。

其次，要让全社会充分认识到智库、高校智库建设的重要意义。政府运用广电报刊网络等多种宣传渠道向社会公众推介智库，通过概念认知、历史梳理、智库贡献、中外比较、现状分析、前景预测等多重视角，阐述智库建设对于现代社会治理已经发挥和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营造了解、认同、依赖、推崇智库的公众意识和社会氛围。

最后，政府部门要加强对高校智库的顶层设计。《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就是典型的顶层设计，以此明确高校智库的方向和参与路径，规范展进程。当然，政府的顶层设计只是一种引导性设计，高校智库需要在这种原则构架之下，根据各自实际情况规划与实施自身的发展路径。

3.2 构建高校智库的多元关系网络

第一，搭建“中国式旋转门”机制。“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最具特色的现象之一。致力于智库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通过其所著《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对其进行了专门介绍。“旋转门”产生和运转根植于美国政治体制。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卸任

的官员很多会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智库的研究者很多到政府担任要职，从研究者变为执政者。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流通就是美国的“旋转门”。由于管理体制、单位性质、人事制度等的巨大差异，我国仅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官方智库与外交部等政府部门之间存在规模极小的类似“旋转门”机制，高校智库几乎不存在“旋转门”现象。

“旋转门”机制对于知识与权力的有效结合确实具有独特效用，我国可以合理借鉴美国经验，探索“中国式旋转门”机制，通过高校智库与服务部门之间相互挂职或兼职借调、交流工作等灵活方式，激活双方人力资源，盘活双方信息资源，以利催生出高质量的智库成果。

第二，优化高校智库与外界的横向联系。其一要强化合作。政府决策不同于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面对问题的实践性、综合性、复杂性，决策问题很难像学术问题那样人为截取一个断面、设计一条线索进行研究，而必须考虑到与问题相关的纵向时间与横向空间的各种因素。从学术角度表达决策问题，即决策大多是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的复合性问题。所以，同一个决策问题的研究常常需要同一高校或不同高校或高校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智库之间的合作，由具有相关背景的人员组成项目团队共同完成决策的研究设计，很多情况还需要临时吸纳一些兼职人员参与其中。其二，要错位式分层次发展。不同智库应各自坚持特色、打造专长，不应为满足阶段性的政策需求盲目一哄而上、贪大求全，以致抹杀彼此界限，形成重复或类同，造成智库资源的整体浪费。其三，要建立信息沟通机制。尽管高校智库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多种联系，但从稳定性、长效性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同政府及其相关组织建立固定的信息沟通机制，以便稳定地获取足够信息，保证研究工作能够尽可能符合客观需要。“政府是思想库获得政策研究所必须的信息和数据的最主要渠道。没有这些资源，思想库研究成果的质量就很难得到保证。”

第三，加强高校智库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这方面，高校智库具有其他智库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调查显示，美国约75%的智库附属于大学。近几十年来，包括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在内的美国大学智库与其他独立智库一起，共同影响着美

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多方面的重大决策。同样，在澳大利亚也有一半以上的智库设立在大学。国外高校智库在国家政策研究市场所发挥的作用，为我国高校智库树立了方向和标杆。由于高校领域跨国交流与合作已经形成了多元综合的形式与渠道，这为我国高校智库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而高校智库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对我国智库整体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无疑将产生带动和辐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高校智库建设不能简单地跟风和追随，因为毕竟是要把握中国自身的需求、研究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要坚持“中国特色，就是要以中国实践为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中国风格为特征，以形成中国学派为使命，以重大矛盾与关系为主题，以专业化研究为手段，以综合集成为方法，拓展中国道路、完善中国制度、概括中国理论。”要本土化地借鉴国外智库的先进经验，不能简单盲目地照搬套用。

3.3 健全高校智库运行的体制机制。高校智库运行体制主要在于处理好高校智库与政府及其所在高校的关系。

高校智库与政府的关系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双方是委托受托关系，即政府委托高校智库承办政策研究的项目；另一方面，双方是市场关系，即高校智库自主产生关于政策研究的成果，由政府决定是否选择采用。本质上，高校智库所提供的是自主研究提出的公共政策方案，政府则是向高校智库购买公共服务方案。

高校智库与所在高校的关系，其一涉及到智库是否独立设置的问题，主要应该解决目前存在的有些高校智库与高校二级行政管理部门合署办公或挂靠二级学院的问题；其二涉及到智库是否成为独立法人的问题，可以探讨建立独立法人、附属机构、挂靠单位、合作举办等多种实现方式，并在此基础上相应理顺智库与高校及政府之间的关系。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属于何种关系，都应该保证高校智库业务方面的独立运转，确保智库的专业化发展，以维护智库的基本特性。

在高校智库体制建设问题上，存在一个类似于“大学自治”的问题，即要求智库尽可能保持独立的价值判断。智库所着力研究和企图解决的问题应该是立足现实并指向未来的，尤其强调其价值层面

的应然性判断。所以，其研究成果必须要有超越现实的理念设计、知识构架和实践设想。因此，高校智库既要服务于政府，又要独立于政府之外；或者说，智库只有独立于政府之外，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政府，这是一种时刻需要准确把握的辩证关系。

高校智库运行机制主要是内部组织结构及其运转。本质上，智库属于开放性的学术组织，所以，应该由科学搭配的人员共同组成扁平式的组织架构，成员可以根据项目需要聘用临时专业人员；工作开展不是简单依靠行政指令而应更多遵循研究需要，交由承担任务的科研人员自主研究。为了保证常规运行，智库需要足够的经费支持，根据智库的具体性质，经费应来自校方、业务项目、资助基金等多种渠道。工作评价标准除了常规的质和量的指标之外，尤其应该突出研究成果被政府借鉴、参考、采用以及实际效果的情况。高校智库要有自己的展示平台，既可以是传统的报刊杂志，又可以是现代的网络载体，或兼而有之，还可以采取报告、讲座、研讨、培训、媒体发布等动态方式。展示本身也是智库运行的组成部分，因为展示可以进一步引发政府及公众关注，提高智库成果被政府采纳的可能性。智库的自我展示一定要实事求是，保持展示内容与成果水准相匹配，切忌哗众取宠，否则只会适得其反，导致对于智库自身声誉和社会话语权的伤害。

4. 提升高校智库的整体服务能力

高校智库要真正体现其价值，根本还在于必须具备足够的服务能力。其一，树立正确的智库意识，这种意识不仅要求形成主动服务于政策决策的积极性，更要求端正态度，将注意力的重心置于服务决策和社会发展的质量上，而不是将智库建设看成是又一种形式的利益获得渠道。智库意识的确立主要应为内生性的自觉意识，而不是仅凭外在的约束。其二，配备业务精熟、结构合理的专业人员，并注意通过类似“旋转门”等机制进行经常的业务培训和实践训练，不断提高业务水准。其三，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研究、学术研究与决策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长线研究与即时研究等的关系。这些关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在每一种关系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具体化、现实化，两者相得益彰，“兼顾基础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直接相关的应用研究，以学术研究为基础，以

研究型大学智库建设模式与困境突围

——基于“学者”使命的视角

郭华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对研究型大学加强智库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研究型大学加强智库建设的第一次重要机遇期始于党的十七大，正式将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库”作用写进党代会报告。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高校要“积极参与决策咨询，主动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充分发挥智囊团、思想库作用”。2011年《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在“主要任务”和“重点建设内容”两部分，均强调要加强高校智库建设，建设一批达到世界水平，享有国际声誉的学术高地和咨询智库。

一、研究型大学成为智库发动机的应然性

（一）古今知识分子担当的历史使命与学术责任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国古代统治者的“食客”“军师”“师爷”“幕僚”等，西方国家诸如古希腊亚历山大身边的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等谋士，都应当说是最初形态的智库，它表明对智者作用的重视，很早就构成了国家治理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及至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欧洲文化的传播，知识分子变革图强，参与时政的热情空前高

涨，甚至投笔从戎也大有人在。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从推翻帝制、抗日战争到建设新中国，知识分子在启发民智、国政治理中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全球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必然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需要用新视角、新方法、新举措来应对和解决，因而高校的一些知名学者常常成为政府部门的座上宾，参与政府决策讨论，甚至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授课。凡此种种，正是党和国家加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的体现。在时间、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借助当代社会科学业已形成的一系列相对成熟、合理的研究方法，针对政策问题展开调研、研究，在更多的收集、鉴别、加工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决策，已经成为一种决策过程的常态。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朱旭峰教授认为当前中国专家的政策参与可以分为四种行为模式：迂回启迪模式、直接咨询模式、外锁模式和专家社会运动模式。四种模式的使用时机分别为：面临政策网络内部强大阻力，专家向公众公开研究成果；“政策之窗”打开，专家较顺利地直接向决策者提供专业分析；专家被利益集团俘虏，成为“砖家”“叫兽”，公众容易判断其言论是否客观，是否带有倾向性；专家成为社会运动的动员者和参与者，“专家身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专家的行动模式是否引起足够多的媒体关注。例如孙志刚事件发生后，

政策研究为导向”，有利于不断提高决策咨询的服务水平。其四，决策服务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接受来自政府的委托项目，另一方面，要自主开展课题研究，向政府推销自主研究的成果产品。其五，多看重实效，少追求虚名，真正的品牌智库是靠实力打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宣传展示只应是成

果推广、实情发布与社会互动。

（秦惠民，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北京100872；解水青，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副教授，山东青岛266555）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校科技》2014年第4期）

几名法学专家两次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就是典型的专家社会运动模式，最终使国家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

总之，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论是决策机构的邀请，还是知识分子多种形式的参与，都在坚守着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学术责任。在国家动乱不安、生死存亡时期，知识分子担当着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的使命，一大批知识分子抛头颅洒热血成为革命者；在国家稳定发展时期，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竭尽可能参与到国家治理的活动当中。学者在政策过程中的责任，主要缘于学术人身份的学术性责任、政治人所应承担的责任、道德人反思性责任。学者一方面通过自己专业化的深入研究积极参与政策制定，另一方面又追求“五不唯”的境界，保持着高度的独立和批判精神。今天，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目的就是增强政策的理性。

（二）厘清大学教师对学术责任的两种认识

事实上，我国历来重视学术研究为政策服务。就教育政策而言，1941年中国共产党即在延安建立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1957年发展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2011年更名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1978年，全国各地先后恢复或建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一些大学也建立或恢复了教育系或高等教育研究所。但笔者调研发现，当前少数教师持以下两种观点：“政府不找我，我就不参与政策咨询或制定”；把院校研究做好，为本校的发展提供管理咨询服务。

“专家”（experts）是运用专业知识（expertise）去影响决策的特殊的政策参与者，包括科学家、工程师、社会科学学者、法律工作者等。持第一种观点的教师是抱着“不主动、不拒绝”的态度。笔者认为这种态度不可取，放下架子，争取把研究成果实践化，远比停留在杂志上更“惠民”，研究成果应经受实践检验。精英理论认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重要和决定性作用的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而不是大众。苛求绝大多数教师参与决策咨询，自然有悖于大学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但对于学者、专家而言，恐怕另有要求。费希特认为，构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包括三部分知识：根据纯粹理性原则提

出的哲学、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历史哲学、纯粹历史的知识；“谁献身于获得这些知识，谁就叫学者”。他强调，“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是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他掌握知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社会”。根据费希特的观点，王恩华教授认为并非所有的大学教师都是学者，大学学者主要指那些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他们不仅关心学术与思想前沿，亦关心国事民瘼，富有人文情怀；他们不仅传授知识，还发现知识、增扩知识、综合知识、运用知识，不断进行思想探索与实践探索。因此，这就涉及了大学教师分类发展问题，不同类型的教师学术责任要求也应体现出差异。例如外语是一门工具，智库可以吸纳少量外语老师参与资料翻译工作。

持第二种观点的教师认为，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服务好学校即服务了社会。管理咨询协会国际理事会（ICMCI）将管理咨询正式定义为：具有资格的独立人员为企业界以及其他单位提供的服务，包括：识别和调查涉及政策、组织、程序和方法等方面的问题，提供适当行动建议，并帮助建议的实施。根据这一定义，黄容霞博士认为管理咨询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外部咨询，院校研究完全可以走出本校，为其他学校提供咨询服务。实际上，已有许多教授走出校门，参与其他高校的发展咨询工作。可喜的是，教育部近年也与五所高校联合设立教育规划与战略研究中心，力图在教育公共政策研究领域建立多个能够凝聚共识，整合资源的优质平台。

“清华大学教育规划教育战略与国民经济战略研究中心（2010年10月成立）、南开大学教育与产业区域政策研究中心（2011年4月成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与经济研究中心（2011年7月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教育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11年7月）、北京大学人力资本与宏观政策研究中心（2011年9月成立）”等“五个中心”既是教育部党组的智库，也是教育部党组为机关部门尤其是国民经济宏观部门提供服务的智库。

（三）研究型大学：学者主要聚集地

智库是“思想库”“脑库”“外脑”、咨询公

司、智囊团或其他智囊组织的通称，是指由多方面专家、研究人员组成的跨学科公共研究机构。“智库”拆开来解释“智一库”，智者（学者、专家等）聚合、一群学术精英聚集的组织与机构。

学者、专家最容易集聚或孕育在什么地方？笔者认为某领域重要权威人物周围或研究型大学。虽然学术界对研究型大学未有明确定义，但基本观点趋同。“在现代社会中，以研究生培养和科学研究为重要职能的研究型大学，充当着一种‘科学的中心’的角色——不断培育新的研究者、担负探求知识之责。”“研究型大学内在的本质特征是以研究为重心，永远培养精英，发展模式个性化。”

“研究型大学培养了众多的精英人才，产生了许多重大科研成果，它对增强一国的核心竞争能力和综合国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13年10月，美国大学联盟、中国九校联盟（C9）、澳大利亚八校联盟和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等四个大学组织在C9年会上联合发布《合肥宣言》，首次确定了当代研究型大学的十项特质。其中包括：全面追求卓越、开展具有深度和广度的重大科研工作、源源不断地输出值得尊敬的毕业生、有负责任地行使学术自由、支持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为国际健康发展作出贡献等等。可见，研究型大学是科学家、工程师、社会科学学者、法律工作者等人才的主场。既然“大学智库要成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改革与发展的发动机”，那么研究型大学责无旁贷。

二、研究型大学智库政策咨询模式分析

王莉丽博士认为：一个国家智库思想市场的形成和繁荣很难在短期内一蹴而就，在当前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大环境下，大学智库最具备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必要条件。顾海良教授从宏观上为高校建设特色新型智库，提出了要求：在理论建设上突出“中国学派”，在战略研究上彰昭“中国意识”，在社会引领上凸现“中国话语”，在政策建言上形成“中国方案”。本研究拟从政策产生过程，探寻一种可供智库借鉴的政策咨询模式。

（一）理论基础：多源流政策分析框架

1984年约翰·W·金通出版了《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提出并阐述了多源流框架。金通认为在整个决策系统中存在着三种源流：问题、

政策、政治。在关键的时间点，三条源流汇聚在一起，问题就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个“关键的时间点”被金通称为“政策之窗”，这些“窗口”是由紧迫的问题或是政治源流中的重大事件“打开”的。所以，金通多源流分析框架特别适合解释重大事件或危机事件发生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周光礼教授认为多源流分析框架对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过程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它不但能够解释公共政策的生成和发展过程，而且可以预测政策的变迁趋势。

金通还强调“政策之窗”是“提案支持者们推广其解决方法或吸引别人重视他们的特殊问题的机会”，该机会是稍纵即逝的。因此，智库机构如果在“政策之窗”开启时，抓住了宝贵的机会，有效提交了咨询报告或积极传播了核心思想，“获得政策制定者高度关注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

（二）多源流分析框架对智库核心竞争力的阐释

李安方博士等认为智库核心竞争力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创新能力、品牌影响力和国际化能力。其中，创新能力的提升是智库竞争力提高的标志，包括提供新思想、新观点、发现新问题、创造新知识。智库的影响力在于其研究成果所形成的品牌效应。其影响力包括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智库国际化能力包括智库发展为跨国智库，研究对象、学术活动的国际化程度以及国际话语权。多源流分析框架为研究型大学智库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指导。

1. “问题源流”是智库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智库的首要职责就在于找准问题，分析其根源，抓住问题的实质，以便提出对策和应对的方案。这是智库创新能力的基础。“新问题”来自哪里？一定是来源于“问题源流”。同时，“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有一部分可以从原有“思想、观点、知识”引申、提炼、开发而来，另一部分还必然是研究“新问题”的结果。故“问题源流”是智库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基础，“问题源流”为智库确定研究项目提供了导向。

大学智库主要是指那些由大学在其他机构、团体的协助下创建的，其经费主要来自校方的资金和一些基金会、企业的资助或私人捐助的思想库。大

学智库的研究人员大多是校内各学科的教授、访问学者和从其他大学、研究机构聘用的研究员，他们承担着培养学生和开展正常研究的双层角色。具体到研究型大学智库，就需要通过“问题源流”倒逼智库、研究人员的定位和重点研究领域的确定。第一，智库研究方向不能太“功利”，服务对象要明确。《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特别提出要通过政策引导、项目资助，有计划地支持高校建设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着力打造有重要影响的国际问题研究“智库”。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的高校若冲着“项目资助”，纷纷去研究国际问题势必徒劳无功。鉴于此，湖北“211工程”“985工程”高校“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强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研究，加快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以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立足中部地区（中南地区）组建1-2个具有学校特色的智库”——这种提法比较适宜。第二，智库研究人员要处理好教学与科研、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关系，提高自身政治素质。事实上，许多国际研究咨询机构都正在增加培养研究生的功能。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的国际和国内学术交流活动非常频繁，得益于其推行的博士后制度及项目研究员制度，也确保了该中心始终有几名高学历的青年人员参与组织学术活动。连兰德公司这样的老牌咨询机构都要建立研究生院，表明机构自主培养和咨询与教育两者之间互动的重要性。国家机构和市场部门往往需要解决眼前问题，制定近期政策。要求智库研究人员，及时调整研究视角，从传统注重宏观理论研究转变为依据“问题源流”作综合研究、应用对策研究，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智库要本着寻求科学真理的客观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展研究，不能“结论先具，以果推因”。第三，突出重点研究领域。研究型大学决策咨询研究应有适合自己的重点研究领域。例如，人文社科类研究型大学品牌智库的培育，可根据智库专家学科背景，在国内公共政策研究、经济策略与促进企业发展研究、国际关系事务研究等方面找准突破口，迅速扩大影响力。对于“985工程”高校或“211工程”高校来说，亦可建立几个智库组织，依据不同研究领域组建相关专家队伍。但一定要有精品意识，媒体宣传的研究成果

要有影响力和竞争力，不能昙花一现。通过优胜劣汰机制，遵循“项目驱动—团队建设—品牌营造”的建设过程，最后确立稳定且具有鲜明特色的大学智库。如中国人民大学自2002年起每年通过组织跨学科课题组研究编写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发布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中国创新指数”和“中国发展指数”三大指数，已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学术品牌。

2. “政策源流”是智库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的定位是“全球第一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成名的关键。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创新能力和舆论影响力。智库的影响力从何而来？智库的影响力在于其研究成果所形成的品牌效益，没有高品质的研究成果，以及在政策理论设计方面提出问题、思想和战略的能力，就称不上一流的智库。“政策源流”可以看作是智库提供的研究报告，包括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有中国学者论说：凡著述，有经验性、实用性而无理论性、前瞻性，失之过浅；有理论性、前瞻性，而无经验性、实用性，失之过虚。”可见，只有具备“四性”（前瞻性、理论性、经验性、实用性）的“政策源流”，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

以“前瞻性”为例。研究型大学智库既要杜绝为政府“背书”、减少对已经发生问题的原因进行探寻，更要提升自己的预测研究能力，即选题一定要有前瞻性。例如世界著名智库机构美国兰德公司成立之初主要依赖于空军交付的研究项目生存，部分项目是兰德认为有意义或会造成重大影响而自主选择的。当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兰德公司撰写了“中国将出兵朝鲜”的评估报告，不料被五角大楼以200万美元要价太高为由拒绝。1953年，美国朝鲜战败后五角大楼又以原价买回了这份已“过时”的报告全文，以检讨当初的决策失误。当前“中日关系的紧张将长期化”，这可能有些特殊，但难免不会成为“问题源流”的可能。在日本政府非法“购买”钓鱼岛、安倍“拜鬼”时，有访谈对象就说：“日本在历史上不止一次侵犯中国。目前现状是钓鱼岛之争，中日谁都不愿先开第一枪。滇西抗战纪念馆留言册上‘中日必有一战’反映了一部分国民的情绪。智库机构能否预先判断出中日何时、

在何范围内开战，一旦开战中国经济、政治外交如何应对，怎样避免大规模战争，百姓生活会受多大影响。”

3. “政策之窗”开启是智库要抓住的宝贵机遇。首先，研究型大学智库要高度关注“政治源流”的变化，洞察“政策之窗”开启的时机；其次，要尽可能地与政府部门维持某种特有固定联系渠道，以便在“政策之窗”开启时，有效地传递“政策源流”（研究报告），同时及时了解政策制定者思考的“问题源流”，并努力参与到决策咨询当中去，积极承担各种决策研究项目。试想，如果政策制定者决定开启“政策之窗”解决“问题源流”，而某大学智库的相关报告正放在其案头，并能使其“醍醐灌顶、茅塞顿开”，那么该智库的影响力无疑会快速提升。

这里还需特别强调：只有“政策之窗”开启，“政策源流”方能得到政策制定者的采用或部分采用。所以智库研究机构对那些暂时未能得到采用的“政策源流”也不可轻言放弃，而是要考虑建一个成果库，以备不时之需。如麦肯锡公司规定“不要重新发明轮子”——识别和认定客户的管理问题之后，不能自行设计解决方案，而是要到公司庞大的资料库中寻找类同案例，利用类同案例解决问题的方案来解决新问题。

三、研究型大学智库建设的现实困境

上文分析了研究型大学智库建设的应然和政策咨询模式，但现有的一些体制与机制问题正成为高校加强智库建设的现实瓶颈，阻碍研究型大学智库核心竞争力的提升。笔者在访谈过程中，多位受访者认为高校建设智库已有国家“政策利好”，一些地方政府已着手开展“智力成果采购招标”工作。但是，两大掣肘仍然制约着研究型大学智库核心竞争力提升。

（一）管理体制：领军人物匮乏，辅助人员不稳定

主要表现：一些智库只有一位领军人物，学术能力一枝独秀，能通过其“金字招牌”承揽各种项目、招标课题，一段时期内也能名声大噪。一旦领军人物由于某种原因离职甚至带走整个团队，则研究机构就难以维系，可能迅速垮掉。此外，一些年轻人尤其是刚毕业的硕士、博士，通常都把入职智

库机构当作一个过渡期，使得智库辅助人员频繁更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人员的效率。因此，亟需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改变当下困境：加强领军人物的梯队建设和辅助人员的队伍建设。

（二）评价机制：指标比较单一，令“学者”却步

科研评价机制不科学是影响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瓶颈。前文提及真正的“学者”不仅有专业能力更是关心国事民瘼，然而现有的科研评价机制却让他们对智库望而却步。当下高校教师的晋升和分级聘任条件主要看重的是“科研能力”，然而科研评价指标比较单一，评级体系比较僵化。许多高校包括研究型大学的科研评价指标仍是：权威核心期刊论文、“两金”课题、著作数。显然，智库的多数“政策源流”（研究成果）不在这套评价体系之内。按照这套评价体系，那些没有按照论文格式发表出来的研究成果、一时或许永久均不能等到“政策之窗”开启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大量的智力思考也许只有一句结论等，统统被排除在外，“学者”的付出都成了“无用功”。科研评价直接影响着教师的晋升和收入，最基本、合理的评价制度和“物质刺激”都没有，智库强大的研究团队从何而来。在中国当选院士可看作是获取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利益的“通行证”。“学者”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令其只奉献专业能力，完全抛开“物欲”不合乎理性。2013年12月，教育部颁布《关于深化高等学校科技评价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对不同科研方向实施分类评价，减少科技评价结果与利益分配过度关联，已经传递出改革科研评价制度的信号，但尚需高校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方能激发“学者”热情。

此外，一些所谓研究机构，虽名曰“智库”，依旧按照传统研究思路行事，继续采取单一学科的研究范式，所取得研究成果往往差强人意；或偶有深度研究报告，但成果推广渠道又不畅通，亦无法彰显其影响。

四、来自中外著名智库的建设经验

笔者比较了中美两个具有代表性和显著特征的智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其建设经验可供国内研究型大学智库借鉴。

（一）成立宗旨：基于“学者使命”

1916年，在圣路易斯市企业家、华盛顿大学董事会主席罗伯特·布鲁金斯的推动下，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私人组织“政府研究所”成立，其宗旨是“运用科学方法研究联邦政府的管理”。1922、1924年布鲁金斯又分别创建了经济研究所和以其名义命名的研究院。1927年合并为布鲁金斯学会，成为现代意义上最早的智库。

1994年8月，林毅夫等在北京大学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旨在建立一个独立于政府机构，专门吸收归国学者进行研究和教学的机构。“下个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虽被外界解读为一句祝词，但CCER的初创元老把它当作奋斗目标，并使CCER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中国政府决策部门重要的智库之一。2008年在CCER的基础上，组建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专业影响力位居2013中国智库排行榜前五。

（二）管理有一定的自主权，研究梯队强大

布鲁金斯学会实行行政管理与政策研究相互独立，前者服务于后者，接受社会捐赠。管理层由董事会、会长和管理团队组成，既有分工又互相制约。NSD亦有“顾问会、行政班子、理事会”三方管理。NSD在招聘教授时亮出“根据被录取者的资格和经历提供富有竞争力的薪水和待遇”、招聘博士后标注“给予额外补助津贴，能力胜任者全年各类补助津贴总额不低于10万”，以招揽人才，显示其拥有比较独立的财权。

布鲁金斯学会有200多位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华盛顿总部，其余分布于世界各地。研究人员兼具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广泛的实践经验，不仅在学术界积累深厚，在政界更有广泛联络。同时，除每个部门定期内部交流外，还有“自带午餐会”，自愿参加，参与某个或多个主题的学术交流。专职研究人员与辅助人员（秘书和研究助手等）的配置比例是1:2，各个保障部门帮助解决保险、签证、电脑、住房等后勤问题。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初创时，即是6位“海归”博士，其中林毅夫、张维迎都曾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95年6月6日，二人就国企改革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被外界称为“北大交火事件”，其后双方都有系列文章发表，

系统阐述各自观点。NSD网站显示现有全职教师40余人，另有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特聘教授、课程教授、兼职教授等近20余人。

（三）积极出版决策产品和宣传“政策源流”

布鲁金斯学会的决策产品主要以出版学术著作、学术刊物以及政策简报的方式展现，宣称其“政策源流”。同时，该学会还通过召开面向公众的研讨会、与政商界团体召开小范围闭门会议、研究员被邀请进入政府工作、接受各大媒体采访及在世界范围内发表评论员文章等方式扩大其在全球的影响力。NSD的出版物主要有：简报、讨论稿、经济学英文刊物、研究报告系列、经济学季刊（CSSCI来源期刊）等。同时，NSD还经常举办各类研讨会、报告会及“朗润·格政”（讲座、论坛、对话）系列活动。

五、研究型大学智库建设困境突围策略

任何一个组织系统都由人、财、物、时间和信息等资源构成基本要素，而在要素管理中最重要的是人的要素。约翰·桑顿强调：任何智库的成功首先取决于它所拥有的专家的实力，智库要寻找的是那些在各自领域领先的优秀研究者和决策者，他们不仅思维缜密，而且富有创新性和创造力，懂得把思想和现实世界的问题结合起来。因此，研究型大学智库建设在解决“人、财、物”三方面问题时，还必须以解决“人”的问题为突破口，即以“学者”为中心，积极谋划更加人性化的管理办法，为智库研究人员提供积极支持和帮助，以解决后顾之忧。

（一）分类评价科研成果，吸纳青年研究骨干

从长远来看，青年“学者”是智库建设的力量源泉。如果不改变当前科研评价指标体系，青年“学者”在生存和来自家庭的压力面前，一些人更愿意从事那些直接带来晋升机会的学术活动。因此必须健全和创新科研评价机制，将智库研究成果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中。建议研究型大学根据《关于深化高等学校科技评价改革的意见》，在广泛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修订教师职称晋升和科研评价方案，对常规性科研成果、智库研究性科研成果进行分类评价。只有对两种不同类型的科研成果进行有效地科学量化，方能促使青年研究骨干踊跃加入智库。

（二）创新完善聘用制度，整合智力资源

据了解，国外对知识分子实行的是两套聘任、评价标准。在大学任教是一套评价和晋升标准；在智库从事研究又是另一套标准。国外著名思想库大多都有一套严格的考核、晋升和淘汰制度。如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在1973年就制定了一套人员评价系统，按功能分为专业成绩、提升、委托关系、计划领导、系统管理五个项目，每个项目又分为六个等级，依次对每个研究人员进行评价和考核，并按成绩决定研究人员的报酬、奖励以及是否晋升、淘汰、是否继续聘用和得到研究经费。

我国研究型大学是否有必要推行两套评价标准，尚需商榷。除了改革科研评价办法，创新“聘任制”不失为一种长远的有效途径。①通过“旋转门”机制，引智纳贤。研究型大学智库可通过调整薪资水平，改善研究环境，聘任校外优秀人才。杰弗里·贝德说过：对于智库而言，有的学者进入政府工作，有的政府官员离开政府后到智库继续从事政策研究，我们称之为“旋转门”。

“旋转门”使得政府和智库之间建立了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和信任度。中美国情不一样，虽不可能直接套用“旋转门”机制，但大学智库应尽可能地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保持密切联系，充分吸收官员、行业精英。②实施“异岗同酬”，校内挖掘人才。参照国外智库研究人员的评价和晋升标准，科学制定智库“研究员”聘任办法，并与教师专业技术各等级一一对应。只要智库研究人员被聘任为与“教授”相对应的“研究员”等级，即可在校内享受“教授”同等待遇，不仅限于工资津贴。建议将教师分为“教学型、教学研究型、研究教学型、理论研究型、实务研究型”等多种类型，其中“理论研究型”主要指做基础研究的、“实务研究型”主要指本研究所论及的“学者”，即智库中的研究人员。“异岗同酬”本质在于加强教师的分类管理，促使教师分流，更多实务研究型人才汇集到智库。③聘用“合同工”，解决专项任务。围绕某个“问题源流”开展专项研究，可临时聘请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尤其是那些处于“学术休假”期的知名教授，“政策源流”产生后聘任基本结束。同时，可向社会招募“科研助理”，给予“合同工”待遇，进行资料收集、问卷调查等工作，以完成专项

任务。

（三）加强智库文化建设，培育后备梯队

林毅夫教授赴世界银行任职——可视为一种“旋转门”的体现，但CCER并没有因他的离去而衰落。其继任者周其仁、姚洋教授分别带领CCER继续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为当代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做出贡献，可堪称研究型大学智库建设的一个典范：注重智库研究人员的梯队建设，一位领军人物的离开，马上有其他人递补，不会弱化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必须加强智库的文化建设和研究梯队建设。

CCER被视为北大的“学术特区”，其他研究型大学可以仿效：大胆使用创新人才，让优秀研究人员脱颖而出；尊重研究人员，崇尚科学研究，追求知识创新；为研究人员提供良好的研究环境。健康和谐的智库文化不但有利于现有研究人员的成长，也能吸引外来研究人员做出研究成果。良好的智库文化应是：众多研究人员愿意团结在领军人物周围，并随时准备尽可能地提供所属学科、研究领域的智力支持；智库领军人物慧眼识才，充分发挥研究人员的特长，积极培养优秀博士生、博士后人才和培育后备人才。

（四）扩大智库自主权，提供必要保障

在视智库为“学术特区”的同时，还需扩大智库的自主权。在学校推行校院二级管理改革过程中，应将智库机构一并纳入。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校院二级管理的关键是权力下放和资源的优化，使学院有较大幅度的决策权；改革的宗旨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办学效益；其根本目的是要解决高校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权力下放需包括适度下放财权。笔者在北大多个院系、研究中心网站上未曾发现捐赠计划。即便如“数学科学学院”网站列有捐赠计划，也仅限于资助学生项目，且捐款对象为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但NSD网站所列捐赠计划则包括：扩建研究场所（承泽园）、聘请知名讲座教授、发放奖学金、举办讲座与论坛、出版期刊等等。可见NSD拥有的财权远远大于一般的学院。CCER建立之初就被当作北大的学术“特区”，林毅夫为了筹款到处做说客，其实质是NSD被推向市场，在走出去中提升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中搏击风浪，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多处论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朱旭峰教授表示，智库的外部制度环境尤为重要，应该建立“政策分析市场”。若政府持续采购智力成果，则可逐步形成“政府分析市场”。研究型大学智库只有参与“政策分析市场”的竞争，才能逐步显现其核心竞争力，形成品牌智库。

同时，还需改进与加强科研政策和资金管理，推行“多轨制”，即科研经费报销制、科研经费提现制和科研经费报销提现混合制。智库研究出的“政策源流”常常偏重于人文社科研究，不需要购买大型设备，关键是思想的创新，比较适合“科研经费提现制”，即根据智库成果的鉴定等级直接获取经费，优、良、中各不相同，仅需依法缴纳个税。未采用则不能获取经费。

当然，智库在参与“政策分析市场”竞争前，学校还应提供基本的保障。建设智库是高校落实《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0—2020年）》的一种实际行动，不能完全视为自负盈亏，初期应有专项建设经费。培育品牌智库是学校提升社会声誉，增强竞争力的一种投资。但智库自身应积极寻求多元的投资渠道，以项目为依托，积极开展社会服务活动。此外，还需要加强图书资料和网络建设。

（五）营销推广研究成果，提升社会声誉

智库要想在竞争的环境中取得一席之地，必须运用商业化的市场运作将其成果推向公众。国际知名智库一般都设立新闻官，并将与媒体建立良好关系作为重点工作之一。通过专业的新闻宣传和社会公关手段尽可能地来扩大智库的社会形象，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因此，研究型大学智库需积极营销推广其研究成果，提升社会声誉。智库要影响社会公共事务，首先必须要让社会了解智库关于“问题源流”的观点和主张，只有发出声音，智库的“政策源流”才能被社会所了解和接受。这不仅需要具有发出声音的能力，还需要依靠一定的发声渠道，智库发出的声音才能持续和响亮。从传播学视角来看，美国智库采取的主要传播方式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三种传播方式应同时采用，互为补充和促进。

总之，未来数十年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智库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机遇期。研究型大学应积极挖掘潜力，整合资源，培育品牌智库，为国家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学校服务社会的能力。虽然影响研究型大学智库建设的因素很多，培育品牌智库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当务之急是应破除制约智库发展的瓶颈，为智库建设积极营造良好的氛围，促使更多“学者”自觉投身于智库建设，发出中国“学者”好声音，才能打造中国的“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

（郭华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高等教育评估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湖北武汉 430073）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4年第5期）

发挥高校优势打造新型智库

——专访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张东刚

《中国教育报》

主持人：近年来，智库逐渐成为中央关心、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您能简单介绍下《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出台的背景、意义和过程吗？

张东刚：在全球化背景下，智库在应对全球化挑战、为政府出谋划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智库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应对国内外环境挑战、破解发展难题、回应人民期待都迫切需要强而有力的智库支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十八大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智库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批示，为新形势下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2013年5月，刘延东副总理在教育部主持召开“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强调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并就如何破解发展难题、推进高校智库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

会后，教育部就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进行了深入调研。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经过“985工程”“211工程”“2011计划”、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等的建设，我国高校科学研究事业取得了极大的发展。近年来，高校紧密围绕国家需要，积极建言献策，一批优秀成果及时转化为政府决策和政策。

2008年-2013年，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承担了600余项国家部委的调研和培训任务，直接参与

了《民事诉讼法》《食品安全法》等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和修订工作，累计有1600余份咨询报告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高校科技专家和研究机构为国家行业产业发展、科技战略规划提供了有力支持。教育部社科委、科技委、专业学会、研究中心向有关部门呈报了系列专家建议。2013年，首批认定设立了14个国家协同创新中心，其中文科有两个，各地各高校也建立了一批自己的协同创新中心，这些都为发挥智库作用、推进智库建设奠定了基础。

我国高校智库建设与国家经济发展需求相比存在很大不足

主持人：目前高校智库建设的水平是否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适应？

张东刚：总体来看，目前高校智库建设还明显滞后，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比还存在很大不足，主要表现在有份量、有影响的智库不多，结构不尽合理，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匮乏，高质量的、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不多，每年提交的咨询报告对重大决策产生影响还不理想。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多种，根本原因是问题意识不强、联系实际不足、评价机制不健全、改革和支持力度不够。着眼解决上述高校智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大力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提高高校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在前期调研基础上，教育部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研究起草和修改完善，并征求了多方意见，出台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与教育部最近出台的一系列举措相同，《推进计划》突出了改革、创新，突出了对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的导向作用。

主持人：您如何理解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象征？

张东刚：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面临着经济、能源、环境、生态、战争等大量全球性问题，综合

国力竞争中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智库成为各国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文化等问题时所倚重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各国政府、经济组织提出研究报告、咨询建议以及预测分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功能和作用。

高水平、国际化的智库建设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象征。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最新推出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美国拥有1828个智库机构，且世界排名前10位的智库中美国占了6个，遥遥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各个国家。可以说，今天美国的强大与它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智库是分不开的。

从世界范围看，大学智库通常在政策研究领域占很大比例

主持人：高校在建设智库方面有什么优势？

张东刚：从世界范围看，大学智库通常在政策研究领域占很大比例。美国75%的智库设在大学。考察国外著名的大学智库，可以发现大学与智库之间具备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大学内部可以形成多个智库。大学智库多是在充分发挥基础研究优势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知识转化和推广的基础上形成的，著名大学均有多个优势学科和优势研究领域，这些研究中心或研究所都可以生成智库，如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国际发展中心、魏德海国际事务中心都是全球知名的大学智库。

二是大学智库的强势研究领域与优势学科互为倚重，长期积累。大学优势学科是大学智库的深厚根基和依托，如胡佛研究所凭借其在国内经济政策、国际事务、环境研究领域的研究而著称，胡佛研究所这几个领域的世界排名都位于前列；而这些学科恰是斯坦福大学的优势学科，在美国最为权威的USNEWS大学排名2012年度分专业排名中，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排名第5位，环境研究排名第1位。

三是大学智库与大学内部其他院系之间形成“内部旋转门”。大学智库和大学之间要充分发挥人才的优势，必须拥有内部转化的机制，在胡佛研究所常驻的100多位研究人员中，80%以上为高级研究人员，有105人次是美国各类院士和各类奖章的获得者。这些研究人员中又有80%以上由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其他院系联合聘任，由胡佛研究

所和其他院系分别支付相应的聘任费用，使这些研究人员可以在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其他院校之间相互转换。

从我国来看，高校也同样具有建设高水平智库的良好条件：一是人力资源集中，高校聚集了80%以上的社科力量、近半数的两院院士、60%的“千人计划”入选者，以及规模庞大的研究生本科生队伍，可以为智库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二是学科门类齐全，有利于解决横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多个学科的综合问题。三是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可以为智库开展政策研究、战略研究提供丰厚的学术底蕴。四是对外学术交流和合作广泛深入，为开展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学术网络。

我国高校智库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较大

主持人：我国高校已有很多的科研机构，是不是都可以称之为“智库”呢？

张东刚：目前中国高校研究机构虽然很多，但堪称高水平智库的还不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与世界一流大学智库有较大差距。高校智库应具有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和公共外交五大功能。

智库不仅仅要建言献策，还要为国家发展提供前瞻性的战略研究成果，及时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良好的决策基础、研究资料和宏观政策解决方案。还要能引导舆论，特别是在国际场合能够发出“中国声音”。

战略研究、建言献策、引导舆论和国际话语需要高水平的人才团队和科学研究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智库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组织，但是，几乎所有的智库往往都是以学术组织的形式出现的，智库研究方向和成果的实用性，决定了智库与传统高校研究机构的差异。

智库产出的研究成果不是主要通过论文等形式显现的，而是通过一种类似于政府采购的方式卖给政府或者企业，为政府、企业提供有价值的知识服务。在智库建设中，如何评价智库水平，如何评价智库成果的优劣，不仅是高校智库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同时也是国家科研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和难点。

主持人：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应该具备哪些特点？

张东刚：一是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牢牢把握正确方向，既要有国际视野，学习借鉴各国智库建设的成功经验，又能立足基本国情，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二是体现高校优势和特色，紧扣国家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充分发挥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的重要功能。三是要有发展理念和组织管理方式的创新。通过深化改革，促进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的优化组合，不断提高智库的创新活力。四是能拿出既有前瞻性、战略性，又有针对性、操作性的研究成果，成为服务党和国家决策的思想高地，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智库品牌。

人才是智库的第一资源和建设核心，应立足高校特点，以学者为核心，创新体制机制，打造高校智库品牌。

主持人：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举措有哪些？

张东刚：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总体思路是：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化同步”新要求，聚焦国家急需，明确建设目标，立足高校特点，以学者为核心，以机构建设为重点，以项目为抓手，以成果转化平台为基础，创新体制机制，整合优质资源，打造高校智库品牌。

主要举措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考虑：

一是建设新型智库机构。这是智库建设的重点，我们将以2011协同创新中心和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为抓手，重点打造一批国家级智库，带动高校智库总体建设；推动社科专题数据库和实验室建设，推动智库研究手段和方法创新；结合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的实施，通过建设一批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机构，建立海外中国学术中心，支持高校智库积极参与和设立国际组织、参加与举办国际会议等，扩大中国高校智库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

二是通过凝聚高端智库人才、加强青年学术后备力量、推动智库人才交流，培养和打造高校智库队伍。人才是智库的第一资源和建设核心，首先要凝聚一批立场坚定，学术造诣高，善于理论联系实

际，熟悉政策制定的高端人才，创造条件支持和引导他们围绕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以及难点热点问题开展研究，及时向中央各部门建言献策，并以各种方式引导舆论；同时要注重加强青年学术后备力量，培育并长期支持一批高水平创新团队，实施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跟踪培养计划；还要通过聘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实际工作部门领导干部参加智库研究，推荐智库核心人才到实际部门挂职锻炼等重点举措，推动智库人才交流。

三是拓展成果应用渠道。成果应用转化渠道是制约高校智库发挥作用的瓶颈问题，推动智库建设，必须着力解决好渠道和平台的问题。要通过鼓励对外开展合作研究、支持举办高层智库论坛等，加强中外高校智库交流平台的建设；通过完善集中报送专家建议的工作机制，建立咨询报告数据库，跟踪汇总分析相关信息等，加大智库成果报送力度；同时要规范发布流程，严把成果发布政治关和质量关。

四是创新组织管理。建设新型智库，关键是深化综合改革，推动管理和组织形式创新。主要推动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大力推动协同，强化校府、校校、校所合作，建立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深度融合的协作机制，改变封闭分散、各自为战的局面；二是改进科研评价，建立以政府、企业、社会等用户为主的评价机制，把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实际贡献作为核心标准，加强绩效评估；三是改革项目管理，建立完善后期资助方式等。四是从健全管理体制、完善政策配套支持、加强经费支持等三个方面为智库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高校智库建设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主持人：当前高校智库建设的重点领域有哪些？

张东刚：高校智库建设的总目标是服务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围绕这一目标，结合高校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按照国家重大需求与高校能力相匹配的原则，当前高校智库建设应当力求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外交与国际问题、“一国两制”实践与推进祖国统一这八大领域里，找准关键环节，

瞄准国家急需，凝练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开展针对性研究。

主持人：高校智库如何瞄准国家需求，明确主攻方向？

张东刚：发现和找出真正需要研究和咨询的问题，是智库研究过程中一个关键的环节。这要求智库与实际部门建立起密切联系。一是要密切跟踪重大决策。全程紧密跟踪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及时提供动态监测、实时预警、效果评估和信息反馈。同时要**加强战略研究**，就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提供决策储备。二是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如选拔推荐高校智库优秀学者到国际组织任职、到实际部门挂职，参与政策制定，推动智库人才在实践中锻炼能力。三是要建立与需求对接的新模式。邀请实际工作部门直接参与选题征集，共同确定智库的重点任务，联合组建研究团队，从源头上解决科学研究与决策需求脱节的问题。拓展成果发布应用渠道，完善专家建议报送机制，打造高校智库成果发布平台，增强对政府决策和社会舆论的渗透力、影响力。

政策建议必须有厚重的理论、多学科的视角和先进的方法作支撑

主持人：如何使高校智库推出更多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提高建言献策的质量？

张东刚：真正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实用性的政策建议，必须有厚重的理论、多学科的视角和先进的方法作支撑。高校智库不仅要出对策，更要出思想，谋战略，特别是在一些前沿应用问题和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范式上取得突破。

提高高校智库建言献策的质量，一是发挥高校基础研究实力雄厚的优势，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重点支持一批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安全具有长远影响的基础研究项目，推出对理论创新具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为提升应用对策研究水平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二是着力推动跨学科研究。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大力推进新兴学科发展，为应用对策研究提供更为有力的学科支撑。三是大力推动科研方法创新。吸收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文科实验室和数据库建设，推动资源共建共享，为

智库建设提供有力的方法支撑和条件保障。

主持人：在教育部最近发布的一系列计划中，都强调了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撑和引领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推进计划》把人才培养作为智库建设的一个重要功能，同时提出发挥人才培养优势，努力培养复合型智库人才。您如何看待智库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关系？

张东刚：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高等教育全面深化综合改革的重心就是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智库建设也必须围绕这个重心进行，事实上，如果离开了这个重心，高校智库建设也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

作为一个社会事业机构，提供高质量人才是高校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从高校科研的发展看我国985、211高校走过的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重视教学阶段，科研教学并重阶段，教学科研融合阶段。科教融合是这批高校发展的更高级阶段，也是一流大学发展的高级形态。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国际化，国家对高校的要求不仅是要出人才，还要出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这符合现代高等教育规律，也是我国高校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时高校评价教师就不再是以教学作为单一指标，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评价大学、评价教学、评价科研将不再以数量论英雄，高等教育发展将进入质量提升的新阶段，这时大学的教学科研必将进入深度融合阶段。大学的科学研究首先反映在人才培养上，将知识创新反哺到课堂当中，这符合知识创新的发散规律和特点。大学教师第一个知识发散的对象就是学生，所以知识创新的成果要进教材，进课堂，进教案，进课件，进学生头脑。这应该是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发展的一个基本脉络。

目前，我国有些高校正处在教学阶段向教学科研并重转变阶段。《推进计划》是面向全国高校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导向，就是高校科研如何处理好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完成教学科研并重向教学科研融合转化。另一方面，人才是智库的第一资源和建设核心，所以《推进计划》提出发挥人才关键作用，着力培养和打造高效智库队伍。

一是要凝聚一批立场坚定、学术造诣高、善

于理论联系实际、熟悉政策制定的高端人才，创造条件支持和引导他们围绕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以及难点热点问题开展研究，及时向中央各部门建言献策，并以各种方式引导舆论；二是注重加强青年学术后备力量，培育并长期支持一批高水平创新团队；三是通过聘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实际工作部门领导干部参加智库研究，推荐智库核心人才到实际部门挂职锻炼等重点举措，推动智库人才交流。

评价机制和评价标准是智库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

主持人：《推进计划》将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改革起到哪些导向作用？

张东刚：评价机制体制和评价标准是智库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通过《推进计划》引导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关注现实、关注民生，为社会发展解决实际问题。

在教育部实施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中，明确要求每个基地每年至少提供一份咨询报告。这不仅体现了基地建设的导向，更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安排，咨政服务质量不仅是基地服务社会的核心标准，也是评价基地质量和水平的基本标准。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不仅需要自评、他评，还需要政评。咨政服务包括咨询报告、社会服务讲座、各种讲课、领导批示等等，其中能否被实务部门采纳，产生实际效益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价标准。

当前，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评价手段单一化，评价指标单一化，评价方式标准化，评价体制机制缺乏弹性和多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本身是复杂多变的，取得的知识成果也是复杂多变的，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往往是唯一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

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则不同，同样的成果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可能会产生完全截然相反的效果。

当前，人文社会科学最认同的是同行评价。但同行评价既取决于评价者的认知，还取决于评价者的学术道德水准等等。《推进计划》强调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评价导向，把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实际贡献作为科研评价的核心标准，完善以贡献和质量为导向的绩效评估办法，建立以政府、企业、社会等用户为主的评价机制，并以此来协调推进高校科研体制机制综合改革，构建有利于智库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这也充分体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人文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的选题要瞄准国家需求和社会需要，要建立在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有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有实际案例支撑，而不能用“想当然”纯思辨的方式研究实际问题，这样得出的研究成果才能真实、可信、可操作，才能正面有效影响政策。

智库建设是深化综合改革、推进制度建设的总揽性抓手

主持人：智库建设在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张东刚：智库建设是深化综合改革、推进制度建设的总揽性抓手，机构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平台建设以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都可以通过智库建设来推动。我们相信，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整合优质资源、打造高校智库品牌，必将有力地推动高校社科领域的综合改革，提升创新能力，促进高校社科事业的创新发展和科学发展。

（记者 唐景莉）

（原文刊载于《中国教育报》2014年3月24日）

中国智库仍需多维度破题攻坚

《人民日报》

相较于当今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影响力，中国智库的发展仍然严重滞后，远未形成与国家发展相匹配的决策咨询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下一步建设和发展，仍然需要在多个纬度上破题攻坚。

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殊，中国智库有必要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智库也正在日益呈现出多元化、专业化的趋势，这不仅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希望，也是国家决策机制日益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然趋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到国家战略层面以来，中国智库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智库数量越来越多，传统智库的内部改革不断加强，一些智库的经费支撑实现良性运作……

在日前由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和人民网强国论坛联合举办的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专家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对这些积极迹象予以充分肯定，与此同时，他们也指出，相较于当今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影响力，中国智库的发展仍然严重滞后，远未形成与国家发展相匹配的决策咨询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下一步建设和发展，仍然需要在多个纬度上破题攻坚。

明确定位，勘定智库的功能和边界

“衡量一个智库的优劣主要看5个方面，分别是它的成果在各国报刊的引用度、各国领导人演讲中的引用度、各个学校学术机构及专家学者的引用度、成果在实践中的转换效果、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说。

据了解，我国目前有各种智库1000余家，但如果以魏建国提到的5个方面进行评估，真正在质量上或水平上能够与世界优秀智库并驾齐驱的中国智库，可谓凤毛麟角。

对此，不少与会专家指出，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属性定位认识不完整，是导致当前我国智库机制建设不健全的首要原因，也是制约当前我国智库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

文认为，从属性定位上看，社会对智库与咨询公司、学术机构之间的边界和差异仍然认识不清。他认为，智库为决策者提供咨询，但未必与决策者想要的结果一致。“在中国，类似‘研究院’‘研究中心’的机构等至少有20万家以上，大多属于由财政拨款、有人事编制、以学术特质运营的学术研究机构，但智库本质上是‘思想工厂’，需要有基于现实议题的思想生产、组装、销售与反馈的复合功能以及相关架构。在这个架构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增加政策研究的活力，显得非常重要。在思想生产机制相对发达的国家，‘为了商业’‘为了学术’‘为了政策’，是咨询公司、学术机构、现代智库相对清晰的三类功能，切不可混为一谈。”

此外，智库研究的价值立场也直接影响着智库的影响建设和功能边界。“独立性”是近年来人们在谈论智库时常常会用到的词汇，但对独立性的理解，却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广泛的争议。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过程中，对“独立性”的理解应该更加理性客观，如果将“独立”引申为智库必须批判，甚至反对政府，那就理解错了“智库”本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既要防止‘独立性’的误解而出现与政府‘对立化’趋势，也要避免仅为政策出台做注脚的‘迎合化’倾向。”王文说。

创新机制，构建智库发展的内在动力

中国社会在高速发展中迎来转型期，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为智库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也为建设和发展优秀的智库带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认为，当前影响决策的话语体系大致有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公众话语和媒体话语四大类。在如此喧嚣的舆论环境中，智库是不是能够很好地理解和把握不同话语的特征，进而能够善用它，能够作出客观的判断，是对智库能力的一项考验。

张力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随着政府更好地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国家管

理进入法制化轨道，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需求也逐渐提高，在这样的决策过程中，智库究竟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都直接关系到政府管理和决策能力的高下。

但是，尽管发展的机遇就在眼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要解决的，仍是进一步推动自身体制机制建设的科学化。“我国智库真正科学化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形成，特别是官方的或者准官方的智库，行政依赖还比较重，民间智库赖以生存的基础，如资金筹措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平等竞争机制等，都还是缺乏的。” SASS智库研究中心主任王荣华说。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孙玉红指出，要建立健全我国智库的体制机制，解决智库生存、运转并进而发挥最大功效的基本问题，必须突破当前存在的几个重要障碍：一是智库产品供需渠道和沟通渠道不畅，二是智库发展相关法律政策缺失，三是智库发展所需的财政资助、立法支持和信息扶持机制缺失，四是智库人才的体制壁垒和国家壁垒难以打破，五是有利于智库发展的市场环境和机制缺失。

此外，智库作为提供思想产品的机构，如何建立更加科学的考评机制，进而催生真正有效的激励机制，也是与会专家普遍关注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认为，研究成果在社会实践中转化率低，是当前我国智库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现有的中国智库在理论和实践中已经研究出一些有价值的产品，但是成果的传播和转化途径却很单一，使得这些理论产品或具体建议不能陆续转化为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陷入了学术成果尚可、战略政策较少的境地，决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也因此受限。”

专家们指出，一些智库发展较早的西方国家已经建立起完整的对智库研究成果及转化率进行评估的标准和考评体系，而在这方面，我国的标准化制度化建设还相当滞后。与此同时，由于各国体制和发展水平的不同，也决定了中国的智库考评机制和激励机制不能照搬西方国家。因此，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过程中，建立一套中国智库的评价标准，无疑是为智库提供发展动力的关键所在。

强化专业，在公共决策中发挥更大效能

国际化、专业化、网络化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目标，但是，当前国内智库数量多、规模小、分布散、效能不高的现状，离发展的既定目标

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魏建国认为，当前国内智库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解读政策多，提供思路少；前期介入多，中后期介入少。“我们的智库最一般的做法就是，政府每出一个政策就拿过来解读，但实际上，如果把智库的作用仅仅理解为解读策政就太局促了。国外的智库都是在引导决策者作出决策的制定，而不是解读政策。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智库来说，当它创造的思想产品被政府或者其他服务对象采纳，它的产品才赢得了销路，它的社会功用才得到了实现，它的影响力才能体现和夯实。”

魏建国指出，当前智库发展中遭遇的困境也与中国社会特殊的发展阶段关系密切。“社会高速发展时期，中国政府碰到的问题都是被动的、应急的、短期的，所以需要智库在很短时间内拿出解决问题的应急方案，这在客观上促使智库在考虑长期的战略问题时提供的思想产品偏少偏差。从根本上说，就是粗放型的产品多，解决问题的产品多，而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方案提得很少，给决策者的选择也少。也正是因为这样，造成了智库在决策制定过程前期参与较多，中期和后期介入少，这实际上不利于国家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与会专家还指出，从跨国互动上看，我国智库国际化的进程还远远不够，无法为中国参与更多的全球事务提供足够的思想支撑。“中国智库尚未形成走向国门的全球组织力，对各国情况的了解相当有限，对一些中等强国的了解与跟踪严重稀缺，中国智库也还缺乏构建全球对话领衔平台的必要实力。相较于当下全球最著名的论坛，如达沃斯论坛、香格里拉论坛、全球财富论坛等，中国智库尚未形成干预全球的话语塑造力，也较少创造出令各国争相讨论的重大战略名词或学术概念。”王文说。

尽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建设和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但与会专家表示，在这些困难和问题面前不必悲观。“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殊，中国智库有必要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智库也正在日益呈现出多元化、专业化的趋势，这不仅是中国智库建设的希望，也是国家决策机制日益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然趋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说。

（记者 刘阳）

（原文刊载于《人民日报》2014年7月31日第17版）